

# 我的厄運

——「反右」與「文革」追記

孔令朋

孔令朋（1919—2002），山東曲阜人，孔子第七十六代嫡系後裔八府长孙。早年燕京大學肄業，武漢大學畢業。中共控制大陸後，留居大陸；「文革」後，曾任上海對外貿易學院教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六、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1994年移居香港。

《我的厄運——「反右」與「文革」追記》，原題《我的厄運》，是以 1997 初版之《風雨人生——巧遇奇遇交織的命運》（香港：天地圖書）同名一章內容全文為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

## 一、本性難移 真言多敗

「誠」在任何國家民族的文字中都是一個美好的字眼。說真話是爲人處世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我自幼年起從家庭、學校、社會所受的教育都是要我做到誠以待人，不說假話。誰也想不到天有不測風雲，我竟因誠獲罪，捱過二十二年的無情折磨。與我同時又有多少人只因有意無意地說了幾句，甚至僅僅一兩句真話就慘遭苦難，決定了過一輩子艱辛痛苦的歲月。

自一九五七年夏天起在中國掀起一場史無前例的反右鬥爭大運動。驚天動地，草木皆兵。曲阜周公廟裏原有銅鑄金人，背上銘文有「多言多敗」之句，戒人多言。在運動中三緘其口之誠已不適用，犯忌的不是多言，有時還不能不言，致敗的只是真話。所以應將之改爲「真言多敗」方符反右實際。

反右運動進入高潮後，據說中國知識分子多具資產階級思想，有些人從骨子裏反對社會主義，所以必須給以迎頭痛擊。因此鬥爭對象僅限知識分子，包括未來將成知識分子的大學學生。在工農兵範圍內不搞運動。因爲工是領導階級，農是聯盟盟友，兵是苗紅根正，他們當中都不可能存在右派。左右對壘，涇渭分明。

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估計約有五百萬人，先後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據薄一波著書透露「全國共劃右派分子五十五萬人，比八屆三中全會的底估計還多四十萬人。」正是值十抽一。不管甚麼出身，只要一當上右派就成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因爲右派分子的思想是資產階級的。

北京和上海是反右鬥爭的發源地和第一線，運動開始得早，打擊面廣。我更有幸得爲上海最早被揪出（一九七九年後稱爲錯劃）的右派分子，以至成了

報紙上頭版頭條的新聞人物。其後的事實更證明我的右派經歷之獨特離奇在全國五十五萬右派當中堪稱絕唱。人無我有，唯我無偶。何以如此？說來話長。

上海國際貿易業在一九五六年春敲鑼打鼓實現公私合營，一夜之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

因爲是合營，所以把公司所屬各原私營進出口行的國外關係全都集中起來，分由各國外員代替原企業仍以原名與之往來。一家國外客戶在上海不止一家對象，一家上海企業也不止有一家國外關係，其間多有重複。由於對國外並不暴露合營公司名義，歐洲各國和上海行家有往來的廠商的函電仍發向原來企業，到上海後再集中處理，所以國外員可以掌握同一國外廠商向上海原私管企業分別發來爲同一業務的報價等，往往發現報價高低不一，言詞深淺不同，表示了彼此業務關係密切的程度。有的向關係好的行家透露信息，告知上海有人競爭請多注意等等。有時對同一件事說法不同，充分暴露了國際貿易中的業務秘密。這些函電同時在手，看起來十分有趣。獨自經營，難窺其秘。

爲了不使對方瞭解上海已經合營，所以對外函電不僅仍用企業原名，而且要用原來信紙信封，再請原負責人簽名。簽發只是形式，業務不經其手，最多可以提點建議或意見。熙成原來的英文秘書是位希臘人，對外信件可以恰當地表達我的意見，此時打統張則失其原有風格。好在有無業務到手已經與我無干了。偶有客戶由國外來訪，則仍由原負責人接待，盡力掩飾。這種經營方式可以說是自有國際貿易以來別開生面，空前絕後的創舉。

當時進口化工西藥的業務對象主要是英、法、德、意等西歐國家，其次是港澳。我被任命爲專司此項業務的國外員，因此我經手的函電最多，約佔往來總數之半，任務最重，工作最忙。在經營中也發現了當初在國營公司領導和支

配下，進行業務的内情和甘苦，我才明白一切商品經營完全按照計劃。怪不得當初費盡心機想要進口任何一項計劃之外的商品都是浪費電報，純屬徒勞。我過去也曾傻乎乎地進行過這種白費勁的努力。

在國際貿易業裏有句話叫：國外關係是衣食父母。同業間相互保密。對國外客戶百般拉攏，因為只有依靠他們與之達成交易才能維持本身的生存。

合營後一切公開，共同對外。我作為國外員思想上仍認為應該代替原來企業和國外維持良好關係，為此對計劃下的死做法常有意見，很不習慣。這時公司裏發起兩項活動，一是提合理化建議，一是勞動競賽。

我在任何時候都難改愛提批評和意見的毛病，既然提倡合理化建議正中下懷。每有所見，就寫成書面意見交給公司領導，先後不下二三十次。他們說都說重視和感謝，卻無一曾被接納。後來才明白我所提的多屬國際慣例下市場經濟的經營方式與自搞一套的計劃經濟背道而馳，甚至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表現。

至於勞動競賽，我認為誰的工作能量大，成果好，人所共見，其本身就是競賽，何必去搞為競賽而競賽的不切實際的形式，甚至在同事之間製造矛盾，不免時出「惡」言，乃致讓熱衷於此者聽了很不舒服。

在這裏我對事態發展和自我估量犯了個認識上的錯誤，自以為工作出色，而對公方領導視我桀驁不馴的看法矇然不知。

季度終了，公司評選先進工作者，每組一人。在國外組開會評選時，組長吳兆璜提出「我大膽提議評選孔令朋，請大家發表意見。」我聽了既暗自得意，又很感納悶。覺得就工作和成果說，評我應是理所當然，何需大膽。結果是全

組一致贊同，毫無異議。不料以我名上報後，公方領導不予同意，堅須重評。主要理由即我對勞動競賽有不滿情緒，平時「怪話」（合理化建議）太多，不符競賽要求。我這時方才如夢初醒，感覺到積極任事還不行，必須迎合喊好，埋頭順從，方合孤意。空言之效遠重實幹。

先進工作者僅為虛名，並無實惠。然而這不失為一種榮譽，表示工作成績受到承認。但在公方領導心目中我因思想不純，「野」性未馴，不足以當此榮銜。其後我在另選先進的全組會議上說：「承蒙大家推薦我，雖未被批准，但我能得到大家的認可深表感謝。我覺得沒有批准比評上先進更加光榮。」這無異又是怪話。

自有勞動競賽以來，先進工作者均出公評，公評而不獲准者極為罕見。說不定有此殊遇者僅我一人，實際上這應是警告性的知趣教育，豈奈我明知真話難聽，而本性難移何！

## 二、初開言禁 戲演雙簧

上海合營公司每週定期舉行政治學習，私方人員分普通班和高級班。高級班學習蘇聯教本《政治經濟學》，我參加了高級班。當時內心深處倒真是想學些新知識，用廣見聞，充實自己。

參加高級班的私方人員都有一定水平，討論起來相當認真，經常提出一些問題，例如既勞動時間是決定商品價值的唯一尺度，那麼同一勞動時間生產出來的商品為何價值不同。出土文物價值連城，如何體現它在地下使之增值的勞動時間等。大家討論的結果總要回到資本主義價值規律的供求律上來。欲求否定，難得其解。

後來由外地來了一位私方人員參加學習，據聞此人學習水平很高，可以擔當起與我辯爭，駁我怪論之責。這樣一來更激發我故意提出問題來向他求教徵答的興趣。我的思維反應比較靈活，你來我往，往往使他難以招架，免不了向上告狀，更使我背上思想反動之名。

一九五六年間，毛澤東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使人耳目一新。初開言禁，人心振奮，以為從此步入了言論自由的新時代。我的心情輕鬆，為之一暢。

有一天，外貿私方學習大組長許軻初找我，說領導上為了貫徹雙百方針，準備召開一次全體私方人員參加的鳴放會，請我當反方主角，用資產主義經濟理論為資本剝削辯護，另請同業徐世長當正方主角，反駁我的論點。所以兩個人的講詞必須事先對好，既要針鋒相對，又要絲絲入扣，像雙簧那樣表演得配合默契，歸結為承認資本剝削。要當作一次學習任務，保證順利完成。

乍聞此言，一喜一驚。喜的是在那麼多私方中偏找到我，可見聲名在外；驚的是戲不好唱，深淺不宜，心中無數。然而既然找上門來，豈能示弱，坦然接受下來。好在提倡百家爭鳴，大可放言無忌。

為了做好準備，我設法借來幾本解放前出版的經濟學概論等書，由中取材強調資本家將本求利，競爭取勝，供求關係決定商品價格等作為發言重點。徐世長和我是武漢大學同學，平時很熟，當着許軻秋的面探討對詞，表達了我的意見，又提供了反駁論據，決意演好這場戲。

會場設在外貿會堂。開會那天外貿私方人員全體出席，還有若干與學習有關的公方幹部和職工代表，千餘座位無一虛席，大家對鳴放辯論這一新鮮事物極感興趣。

熙成商行在同業中不受注意，我不曾在同業公會中擔任任何職務，開會也不去。與同業接觸較少，大家多不知我。我一生好名，喜歡出人頭地，得此嶄露頭角的機會，正宜表現一番，企求一鳴驚人，有把握可以以假為真地進入角色。

大會先由幾個人輪流談談體會，最後才是「資奉是剝削嗎？」的辯論。我先出場，爲了想壓住陣勢，製造氣氛，往台上一站，略加掃視，開口就說：「過去我們有資本，所以被稱爲資本家。現在我們的資本都已交出，所以不應再是資本家，而是企業家。」企業家三字說得一字一頓。引起群情活躍，掌聲雷動，經久不息，充分達到了鼓動聽衆熱情的效應。因爲企業家一詞既新鮮又生動，其前沒有人敢稱資本家爲企業家，此說切合衆意，出乎意表，才會大受歡迎。如果有人已經講過，我則不會在此拾人牙慧，失其創意。

接着我舉了幾個例，說明資本家賺錢只有資本還不夠，必須還要依靠機遇、眼光、魄力、經驗，知識，策略、勤勉、才能等以達成功之道。發言經常被陣陣掌聲所打斷，我知道自己是成功了。

徐世長最後上場，上來就說：「孔令朋給我出了個難題，我的反駁力或不足，但是真理。」辯論的目的原來是想使大家加深對資本剝削的認識，由於聽衆的身份和意識，其結果適成其反，與原來期望背道而馳。

這次辯論使我在外貿私方人員中聲名大振，無人不知。不少人表示贊賞，不禁暗自得意。求名得名，躊躇滿志。當時難料這正為後來的命運發展佈下潛伏危機。

### 三、奉命帶頭 放膽鳴放

一九五六年秋在中國大陸確實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輕鬆舒暢，煦和溫暖的新氣象。也許由於風向轉彎，領導上對我的看法也隨之改觀，在合營公司正式發表任命時我被安排了業務一科進口組副組長，職位雖低，意義不小。

因為合營之初，一切私方人員的工作安排，從組長、科長到副經理都由公方和同業公會幾個負責人協商決定。熙成原是五反退賠未清的資負倒掛戶，能進合營已屬網開一面的特殊照顧，任何職位自然輪不到我。安排之初都是臨時名義作為過渡，及至歲末公司定上正軌，人員要再正式任命。我對此本未經心，因為有無職務不影響工資收入。不料在發表時我竟榜上有名，任為副組長。難能可貴的是所有人員都是各仍其舊，由一般組員新被提升者僅我一人，不能不使我感到意外。主要在於這意味着這是對前些時不批准我為先進工作者的決定的否定。當然，在那時無法預知這一個最起碼的職位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我以後數十年的命運。

名單發表的當天，公司公方經理吳福榮找我談話。他說：「你的工作表現十分出色，我們知道你過去的經歷，所以考慮提拔的任命。希望今後能夠體會對你的信任，身份不同了，要更好地為黨工作。」話未明說，實則是提醒我以後少提意見，應像學習中所要求的那樣：做黨的馴服工具。

任職未久，坐席未暖，己任私方科長的陳麗泉（現在香港）對我說：「現在有個鳴放機會，第三期工商界政治學校即將開學，要有組長以上的職位才能進入市校，研究下來，你最合適，所以決定推薦你去。」良機難再，當即同意，自此走上了厄運連連的道路。

市級工商界政治學校已開過兩期，第一期是頭面人物榮毅仁、劉靖基等；第二期是一九五二年五反運動時保護過關的重要工商界人士三百另三产；第三期則是組長以上私方人員。人數更多，規模更大，目的是提高認識，改造思想。自一九五七年初開學，學習期間預定兩月。一般私方人員則參加區級政校。上面我說起碼的職位影響今後的命運，是因為 如果不被提拔，不進市校，雖仍不可避免的當上右派，然而其後遭遇就大不一樣了。

上海工商界第三期政校（下稱三期政校）由各行業混合編組，我所屬的組，組員來自不同外貿合營公司和房地產業的私方。每組十幾個人，每天學習六小時，都用於聽報告和討論。既然號召大鳴大放，向黨提批評意見幫助整風，自可海闊天空，高談無忌，形式別緻，氣氛祥和，很合我的口味。

在我入校之前，對外貿易局主管人事和學習的兩位領導找我談過一次話，慎重其事地要求我到校後積極帶頭，大膽鳴放，暢所欲言，勿稍顧慮。我表示人微言輕，難以當此重任。當然這是客氣，並非真意。他們就指着辦公室牆上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十六個大字對我說：「這是我們黨的方針，你放心好了。」我體會帶頭鳴放無異是給我的光榮任務。

進校之後，校方領導也找我談話，要我主動大膽，積極帶頭，活躍鳴放氣氛。並且告訴我，不安排我擔任組長是爲 了讓我有更多時間，更少拘束，更好鳴放。

這兩次談話猶如兩把尚方寶劍，既然辱承領導信任，如不盡力而為，豈不有負重託。所以我真是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過有個原則，必須有理有據，實事求是。幾次發言之後就在組內建立起聲譽，全組同學都對我深表好感，真能起到帶頭作用。

時至一九五七年春，全國掀起鳴放高潮，報紙連續發表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人民日報四月十日題為《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中央統戰部號召黨外人士多發表批評意見等文章。文章中說：「放，就是要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現在還是放得不夠，不是放得過多。」；「黨外的議論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好在這些議論，大多數是批評得中肯的。」；「不要怕向我們共產黨人提批評建議，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如此等等，使人如沐春風，沉醉於大鳴大放的舒暢心情中。與此同時，報紙報道打破禁律，接二連三地刊登著名民主人士如章伯鈞、章乃器、龍雲、儲安平等人的發言和各地鳴放情況，給大家以啟發震動，活躍了思想，激發起熱情，深感言論解放，群情歡悅。不想把皇帝拉下馬，只想持國者洞察民情。信言鑿鑿，還怕甚麼呢？

約在五月廿日左右，新聞日報發表了上海市政府參事魯莽的一次發言，要求共產黨把隔絕群眾的牆和溝拆倒填平。這個發言引起全組共鳴，討論結果要我寫一封信奉不積極響應。我手癢難搔，當晚寫了一篇短文，言詞犀利，切中時弊，大受全組讚賞，準備投寄報紙。可是組長張顯崙婉拒領銜，群推由我首簽。我想既敢寫何不敢簽，而且好名成性，不假推辭。隔壁一組聞訊而至，要求同簽。於是兩組學員全都簽了名，由另一組組員吳毓驤（上海清華校友會會長，民盟成員）和我親送新聞日報，面交總編輯名記者陸論（後亦錯劃右派）要求發表，當獲同意。

五月廿五日新聞日報原文發表了這封信，題為「三期政校孔令朋等廿九人支持魯莽發言」，大家都很高興，聚餐慶賀，在全校引起轟動。後來其他組也有仿倣投書，未被刊用。這封信在全市也有一定影響。讀者紛紛來信支持，更有人對文章筆法深表贊佩。

自此以後，我在校內聲名大振，不少人有了問題就找我解釋分析，徵求意見。校方為此成立了一個問題研究組，由我任組長，負責解答各組學員提出來的種種問題。由於學員水平參差不齊，有些問題提得相當粗淺偏頗，而答覆時必須出我之口，聽者不察或會以為是我所提問題，心中也不免有些委屈，怕被誤認我竟如此幼稚無知。

好景不常，風雲陡變，在得意中逐步走入厄運的險途。

#### 四、最早右派 頭版頭條

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甚麼？》，六月十日發表了《工人說話了》，口氣很大，來頭不小，讀之愕然，心裏倒真的起了問號，「這是為甚麼？」

秀才畢竟具有幾分呆氣，不是工人階級先鋒隊要人家說話的嗎？不是不論說得在理不在理都是「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嗎？及至六月下旬看到香花毒草六條標準，為時已晚，然而同樣是一個人發表的題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為甚麼早些時聽口頭傳達的內容不同於發表的文字，這又是為甚麼？實際上怎樣想已經沒有用，聲勢浩大的反右鬥爭吹起了動員的號角。

有警覺的人都適時轉變了口風，人嘴兩張皮，怎麼說都可以。而我既已成為眾人心目中的鳴放典型，轉不過彎，改不了本性，放不下架子，不願為了說

假話損害已經建立起來的直言無忌的盛名。心想反正我有奉命帶頭的尚方寶劍和大公無私的領導保證，諒來不至有事，所以在小組裏不僅沒有三緘其口，依然照談不誤。對雙百方針的前後說法不一，表示難以理解。

三期政校原定學習兩個月，爲了放手鳴放一再延期，直到報紙變了臉才宣佈結業。就在面臨結業前約一個星期，校領導又找我去要我執筆寫一篇《上海工商界告台灣工商界書》，準備送交電台對台灣廣播。我假作推託說：「我在上海工商界碌碌無聞，寫這樣正式文章恐難當重任，最好另請高明。」其實意在試探。答覆是：「我們研究下來，非你莫屬。這封信是代表上海工商界，非你個人。下午務必交卷。」我等於吃了一顆定心丸，現在正在大門右派，我既然能代表上海工商界對台寫宣傳文章，想必未失信任，右派看來輪不到我。

誰知事有出入意外者。也許是「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信則人任焉。」等孔子的話深入我心，使我天真過了頭。就在寫對台文章後不久，結業前夕之晨，我來到組裏突感氣氛異常，人人端坐不語，面容鐵板，不論我找誰說話，無人理睬，不看我，不回答。我故意找平時對我最表贊佩欣賞的謝繼祐說話，他只是閉目養神，毫無表情。我知大事不好，就說了句：「我瞭解你們的心情，我只想說我從來說的都是真話，沒有欺騙過你們，也沒有做過對不起大家的事。你們不說話，我來奉陪。」

可是，他們奉命不准說話，又奉命不准不說話，不過是要說一樣的話。我到組未久，組長一個暗示，大家同時起立走了出去。只剩我一人不知如何是好。幾分鐘後有人來召我去禮堂，原來在那裏已經擺好了陣勢。包括其他各組代表在內的學員同來參加我組批判會，奇怪的是重點竟然不是言論而是要我交代和上海正在批判尚未戴帽的大右派，中國民主同盟負責人彭文應（一九七九年後

未被改正的五位中央級右派之一)的關係。彭和吳毓驤相熟，組內早有談論，人人知我不識此人。不知爲何此時包括吳毓驤在內卻一字排開，像演木偶戲似的，說我和彭關係密切，謊稱素無往來，欺騙大家。這真使我又好氣，又好笑。我知道他們是在演有人牽線的木偶戲，只是說：「我不認識彭文應，你們心裏比我還明白。」我又說：「你們都知道我一貫說真話，希望你們也說真話。」會開了僅約半小時，各組代表發了言，各說各的，並未鬥我，就結束了。

會後，學習大組長史繼盛來我家問我意見，表示同情。我大發牢騷，並且說：「今天的會，我們組的人人人說假話，只有我一個人說真話，這是爲甚麼？」他向我透露了我不能畢業的訊息，並沒有說我將成右派。

次日，一九五七年七月廿九日，三期政校舉行結業典禮，宣佈我不能畢業，因爲學習不好，必須補課。真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我已心中有底，對此不感意外。心想不畢業就不畢業罷，並未理解不畢業意味着甚麼。

數日後，一九五七年八月三日晨起閱報，我名豁然在目排在新聞日報的頭版頭條，其他各報亦載顯著位置，冠以「右派分子」。想我在解放前曾是經常見報的新聞人物，解放後竟得在五反運動中受到報紙表揚，卻從未成爲頭版頭條。求名得名，惜非其時。憾非其所。

更使我感到遺憾和不平的是報載我的「罪行」，雖只舉了兩個例，卻都是比斷章取義還更不符實地強非我之言以爲我說。真是陷人於罪，何患無詞。

在這之前京滬各地報紙已經從鼓勵鳴放轉向批判謬論，著名人物如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和錢偉長、費孝通、曾昭倫、陶大鏞、吳景超、黃藥眠等廣大教授以及上海的彭文應、陳仁炳、孫大兩、李康年等都先後受到批判，他們

都是還未正式戴右派帽子的准右派。而我雖不見經傳，不受批判、卻得搶拔頭籌，最先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揚名上海，豈非異數。在全國五十五萬右派分子中名列榜首，我何幸哉！

## 五、右派榮歸 稀世孤例

古今中外，右派原是獨創之物。我以右派榮歸，堪稱稀世孤例。

一九五七年春，上海國際貿易業已經完成了「聯合國」的歷程，我被任命為國營中國進出口公司（簡稱中進）化醫部西藥進口組私方副組長。三期政校結束，我要作為國營公司員工向中進報到，步入這個新的環境，戴着右派分子帽子，不知等待着我的是何命運。原以為免不了又是一場批判。

事有出人意外者，報到之時由公司黨委書記和經理等召開了一個小型歡迎會，歡迎公司所屬私方人員學成歸來。人僅三四，我為其一。公方表示歡迎，私方暢談感受。我只好主動檢查，自認學習不好未能畢業，今後應再加強學習，公方領導既未表態，也未批評。

次晨正式上班，進入化醫部辦公室，只見已為我準備好一張大辦公桌，臨窗面江，俯視外灘，遠眺近覽，景色宜人。與我對面而坐的是公方組長馬思武，他是小提琴家馬思聰的哥哥，曾留學法國，娶妻法婦，文革中因此折磨慘死。

辦公時間一到，全組舉行學習會，由科長許怡秋主持，首先對我的到職表示歡迎，大家鼓掌，使我頗感驚異，當即發言，慚為右派。許科長說那是思想問題，不影響行政工作，囑我安心任事。機密函電文件等由我收拆先閱。環顧十數組員全是我在熙成時指揮我向海外進行業務聯繫的幹部，當時企業生存大權操在他們手裏，如何交易唯命是從，而今我竟成為他們的組長，真是做夢也

未想到。大家都是熟人，不過，以前私營受國營領導，見面時嚴肅認真。不拘言笑。而今，同組共事，在工作上不分公私，在名義上又分公私。

更想不到的是，我剛坐下來就有人送來一份聘書，以公司名義聘我為業務改進委員會委員，當天參加會議。這不啻是以右派身份參與改進國營工作，想來是事先備好，未因我已成右派而予取消。

我既已被公開宣佈為 右派分子，卻在國營公司裏以右派身份領導組內包括共產黨員在內的幹部，拆閱機密文件，參與計劃執行，接受委員新命，如此等等。今日聽來這似是天方夜譚，難以置信，然而這卻是我的真實經歷，我不知在五十五萬右派分子中有誰有與我相似或相同的經歷。

實際上，我之所以受此殊遇，並非獨承厚愛，只是出道過早，上海反右鬥爭雖揭帷幕，尚未正式普遍展開，從提倡大鳴大放到「工人說話了」是個突變，從外貿局到中進公司誰也不知右派分子這個怪胎究應如何對待，所以只得一仍其舊，照章辦事，使我有幸成為 右派榮歸，有獨無偶的全國孤例。

## 六、製造右派 引蛇出洞

全國五十五萬右派分子都是刻意製造出來的，原是試製樣品，繼而成批生產。成群的蛇，被引出洞。

右派之所以成為右派，絕大多數都因曾說過一句、幾句或者多句的「錯」話。「錯」就錯在話是說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場合，受了錯誤的誘導。「錯」是相對於「對」而言的。「對」就是燕語鶯歌，鸚鵡學舌。可悲的是，幾乎所有的「錯」話正是真話，真正反映了歷史的真實，社會的真相，言者的真心。

在今天看來，經過實踐的檢驗，歷史的查證，絕大多數當年的「錯」話都是實事求是的真話。可惜，資料全毀，收集困難。否則如將當年全國右派分子被打成「右派」所依據的「謬論」，彙集整理，分析辨正，一定會成爲 世無其匹，包羅萬象的治國良策的時代巨著。

那麼多的「錯」話從何而來？一般情況下友朋相聚，議論評說，既不會廣爲 流傳，也不致形諸文字。可是，反右鬥爭運動全面展開後，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機關、企業、工商教醫等單位無不熱衷於千方百計，八面張羅地挖掘右派。因爲根據人必遵從的科學論據，說是凡有人群的地方都存在着左、中、右，所以既成人群必有右派。如無右派豈不成爲 對偉大科學論據的背叛與嘲弄。右派的表徵是思想言論。言論反映思想，抓言論乃成首要之圖。

言論到哪裏去找呢？這容易。前些時不是號召鳴放，幫助黨整風，歡迎提批評意見嗎？有鳴放有學習有開會就有發言，有發言就有紀錄。不難從中尋章摘句，揪住辮子，黑紙白字，在冊難逃。如何斷章取義，北京首創榜樣。此外，還可發動群眾相互揭發，爲了保身求安，何顧友情道義。於是採取貼大字報形式，你揭發我，我揭發你，有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來我往，一箭雙鷗。那些懂得察言觀色，三緘其口的人免災了；那些能夠站在別人的肩膀上往上爬的人有福了。

言論既得，篩選分析，突出重點，抓住典型，以指定人物爲 對象，開會批判，上綱上線，此時錯話升級爲 謬論。所以製造一個右派一般都要經過貼大字報，開批判會的過程。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凡是已被選作重點的人物不被戴上右派帽子者幾希。因爲 是從人群中發現揪住的，所以稱爲揪出右派。

由於權威科學論斷又明確指出右派在人群中的比例應為百分之五，因此不少單位的百分之五作為計劃指標，四捨五人，多退少補。以致往往甲單位右派超額，乙單位計劃不足，評定出現參差。同樣一句話在甲單位上不了榜，在乙單位脫不了身。說同樣話的人是否是右派，其命運不決定於其本人思想言論，而決定於所在單位的「右派」產量計劃已否完成。到一九五八年三月後又來了一次反右補課，補進幾萬名「漏網右派」。

據說有些主管天良未泯，認為本單位沒有右派，或拒不上報，或坦言無「右」，這顯然違背了人群中必有右派的權威論斷，其上級往往就將這些不識時務，不信「權威科學」的主管打成右派。至此反右鬥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偉大勝利，無怪毛澤東事後評說：「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有人認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實際上是一九五七年。」

右派揪出後，審查定案，打入冷宮。等待他們的是從一九五八年六月公佈處理辦法到一九七九年錯劃改正，長達二十二年的精神折磨，生活艱困的厄運。

如前所述，由於我之出台早在反右鬥爭正式展開之前，所以事前無警，事後無驚，來得突然，得享殊榮。沒有經過貼大字報，開批判會（除在三期政校畢業前象徵性的那一次外）的歷程。如此經歷，極為罕見。我當右派也當得與眾不同，在生活中又是一次奇遇。

## 七、右派謬論 包羅萬象

我身膺頭版頭條的上海最早右派，究竟說了哪些被稱為「右派謬論」的「錯」話？

我在三期政校學習長達五月，每天六個小時除偶聽報告外，其餘時間都用於討論發言。我所在小組同學彼此「臭」味相投，以我為中心，高談闊論，天南地北，真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所以在反右鬥爭中同組同學被打成「右派」者居其半數。我很歉疚，其中有人或多或少地受了我的影響。

除非沒有反右鬥爭，否則我不為右派，誰為右派。居之不疑，當之無愧。敢吐真言，無悔無恨。我的「謬論」可謂包羅萬象，針砭時弊，切中要害。惜乎資料盡失，只能憶其大概，記其要者。真假對錯，請讀者自作評說。

茲分為五個方面，簡述如下：

## 反 黨

1、我說：「應該是中國共產黨，不是共產黨中國。」

2、我說：「國人愛國，古多佳話。仁人志士不自今日始。所以人民因愛國而愛黨，非因愛黨而愛國。」

3、我說：「大鳴大放正像放帶哨風箏，放得高，鳴得響。不過放風箏的線操在人手。欲放則放，欲收則收。」

4、我說：「人的思想猶如春草，消滅不盡，生長不息。詩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鋤之無益，何禁之有。」

5、我說：「現在對外貿易時生差錯，造成國家損失。私方經理應負全責。因為公方責在領導，不懂業務情有可原。難道你也不懂，聽之任之，甘見其敗。」

6、我說：「群眾中來，群眾中去。可是黨群之間有溝有牆。黨凌群上，可望而不可及，可敬而不可親。」

7、我說：「從前講共產黨的會，國民黨的稅，如今兼而有之。有開得完的會，沒有繳得完的稅。」

## 反社會主義

1、我說：「聽周原水教授（權威理論家）報告說：社會主義不怕人多。現在我國人口八億，過幾年番上一番到了十六億，人多力量大，建設社會主義更有把握。可是，他沒有講人多力量大，肚皮多，飯量也大，那麼多人，吃甚麼？」

2、我說：「報告說：美國生產過剩，經濟危機，不多幾年，必致滅亡。他們把剩餘牛奶倒在河裏，不給窮人喝。我們比他們好，牛奶不多產，窮人也不喝。」

3、我說：「幾次報告同舉一例，美國工廠發明了日光燈的技術，藏之多年，秘不生產，爲了怕影響燈泡銷售。制度腐朽，扼殺進步。我們生產商品，多年一式，用不着有此顧慮。例如縫紉機、熱水瓶等老奶奶見了就像看到當年嫁妝，用不着保密。」

4、我說：「資本主義市場競爭，漫無計劃，產品逼得爭奇鬥勝，花樣翻新。工人飽受剝削，生活貧困，買不起好東西，新東西，以至生產過剩，時處危機。我們是全國一盤棋，產品一律，人民生活優裕，豐衣足食，只因勤儉耐勞，不買好東西，新東西。所以也沒有必要生產好東西、新東西。」

5、我說：「聽報告，解放前河南習俗，地主有初夜權，佃戶結婚要把新娘送去由他優先享受。我是北方人，從來不知當地主還有如此好處。現在好了，河南消滅了地主，農民不再怕初夜權，可就是怕窮得娶不起媳婦。」

## 反馬克思主義

1、我說：「世界萬物都在不斷地發展進步，馬克思主義應該也不例外。馬克思如多活幾年，一定有更多的傳世之作，更新於《資本論》。假如他在今天復活，一定抱怨為甚麼任何事物都允許發展，唯有他的思想不准發展。」

2、我說：「馬克思從歐洲看社會發展，五種生產方式自然千真萬確。現在肯定地說世界上絕無例外，中國亦然。中國曾有奴隸不錯，但沒有以奴隸為主的生產方式。解放前中國社會既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又何來資本主義社會？」

3、我說：「勞動時間是決定商品價值的唯一尺度。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出土文物價值達城；同一勞動時間生產同一商品，因質量優劣影響價值；城市發展房地產增值，如說供求規律反動，不起作用，怎樣體現這一決定價值的唯一尺度？」

4、我說：「資本家殘酷剝削工人，佔有剩餘價值，資本家窮奢極慾，工人們貧困悲慘，所以工人階級必會起來革命，資本主義自掘墳墓。不知道美國工人是願到中國來當家做主，還是中國工人願去美國飽受剝削？」

## 反蘇

抗戰時期，我在內地看見蘇聯志願空軍來華助戰，紀律嚴明，戰功卓著，深表敬佩。勝利後，蘇軍在我東北的種種行爲 使我開始對蘇聯轉變觀感。解放後，一面倒，蘇聯成爲老大哥，對我進行名爲無私的援助，實則佔了經濟上的衆多便宜。國家遭受損失，還要感謝恩賜。搬走日本遺下的東北機器，被說成是正義行爲 。我有一次在火車上眼見蘇聯空軍在山東某站半夜上車，驅散卧車上已經熟睡的中國旅客，強佔鋪位，酗酒狂歌。當年美軍在華似也無此橫行霸道。再加上對蘇聯人民生活富裕美好的過份渲染，不切實際的頌揚吹捧，使我認爲 今之崇蘇遠過昔之崇美，有失民族自尊。老大哥以其自身的行爲表現，目中無人的狂妄自大，見聞既多，反感益甚。爲此，時常發表反蘇言論，語多尖刻，使親蘇者聽了很不舒服，我敢不滿於今世完人，被稱爲 反蘇專家。實際上我的反蘇，出自愛國自尊，反感來自過份親蘇引起的負面反應。

茲舉反蘇謬論數例如下：

- 1、我說：「常聽說蘇聯的今天我們的明天，看了蘇聯的今天，希望我們沒有明天。」
- 2、我說：「凡有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跟着吹捧老大哥的無比恩情。吹捧之前，最好問問自己的良心。」
- 3、我說：「看見蘇聯老大哥，更使我堅決相信人是猿猴變的。」
- 4、我說：「蘇聯手錶銷售宣傳保證每天時差不超過五分鐘。最好是快五分鐘，中國人佩戴可改開會遲到的毛病。」
- 5、我常說一個蘇聯政治笑話，聽自上海外僑。

在克姆林宮裏有一個大廳，裏面分別懸掛被蘇聯宣稱世界尖端科學發明的每位俄國發明家的肖像，詳細說明這些是世界上最先發明飛機、無線電、電燈、電話、汽車、大砲、鐮、原子彈、盤尼西林等的俄國偉大發明家，供人參觀讚賞。大廳後面還有一個更大的大廳，富麗堂皇，華美無倫。大廳盡頭懸掛一幅巨大無比的畫像，標名是首先發明前廳那些發明家的世界上最偉大的發明家——赫魯曉夫。

6、我常說的另一個政治笑話，也是聽自上海外僑。

上海白俄受命分批回國，待返白俄心懷疑懼。有一個白俄在給好友送行時秘密商定，回蘇後如生活得像宣傳的那麼好，就照一張立像回來；如生活不好，就照一張坐像。幾個月後，在滬白俄接到朋友如約寄來的照片：躺在地上。

7、我說：「蘇聯幫助外蒙獨立，使中國版圖由大變小；幫助波羅的海三個小國由獨立併入蘇聯，小國喜成大國。」

8、我說：「報告說蘇聯工人生活優裕，人人都有小汽車。看起來美國工人確是浪費，汽車都開在街上。蘇聯工人懂得節約，汽車都放在家裏，所以馬路上看不見那人各一部的汽車。」

9、我說：「不看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不懂甚麼叫無私。他們把從中國換去的出口商品，以低於中國價格拋向國際市場，幫助我們減少自銷、運輸和收匯的麻煩。」

10、北京開了一家莫斯科餐廳，除名稱外完全是地道國貨。可是報紙報導說，莫斯科餐廳裏的蘇聯大菜，精美可口。盤裏是鮮紅的西紅柿、碧綠的黃瓜。

我看了深感肉麻，我說：「一定是記者寫錯了，既是莫斯科，應當是碧綠的西紅柿，鮮紅的黃瓜」。

11、我說：「蘇聯人民生活美好富裕，就是忘了向中國要求出口一批紅幫裁縫，替他們做幾件像樣的西裝。」

12、我說：「解放後才知道日本投降完全因為蘇聯早兩天的宣戰，一舉擊潰了關東軍。美國早知如此，就不該在蘇聯宣戰前向日本投放原子彈，白死那麼多人。」

## 其 他

1、我說：「胡風胡說中國輿論一律。我國既無輿論，何來一律。」

2、我說：「西方是假民主，選而後舉。我們是真民主，舉而不選。」

3、我說：「俗語說：『成則為王，敗則為寇』。這話不對了。像李自成因為失敗才成為倍受頌揚的農民起義的偉大英雄。誰也不敢說他是寇。他打進北京，屁股還未坐穩就急稱大順皇帝。如果成功，就成了反動皇帝。何幸而失敗，今日尊為農民英雄。我相信如果讓這位偉大人物自己選擇，他一定願當當日皇帝，不當今日英雄。」

## 八、反面教員 頓失優遇

我在私方組長任上，照常工作，悠然自得。如此數月，風雲驟變。上海外貿系統開始全面反右鬥爭。開始時，我在組裏例行學習時，也曾有人對我進行幫助，輕風細雨，不痛不癢。學習時間一過，我依然向那些公方職工佈置任務，

批閱文件。不久，私方人員又入政校學習，這次只限外貿系統各公司，單獨組校。別人去了，沒有喊我，於是心存僥倖，以為已經過關。

此校開學未久，有一天我被通知明日去校報到，說明要我交代問題。校設香港路，到后在樓梯口碰見老朋友李春祐（後來自殺），他見四週無人，暗對我說：「要鬥你了，當心。」上樓方知已經擺好戰場，通知我的開會時間略遲，便於預先佈置，做好準備。

走進會場，架勢威猛。有電台，有記者，個個同行原多熟人，此刻面容肅穆，如臨大敵。好在我見過市面，知道好戲又將開鑼，處以坦然。心想你們要我講，我就全盤推出，宣洩真情。你們都曾吹捧過我，為我的「謬論」叫好，我也不能人有負眾望，讓大家聽聽我都說了哪些話。是真是假，是對是錯。你們自己衡量判斷。

在宣佈由我交代後，我就穩立麥克風前神態自若，聲容並茂地侃侃而談。分門別類，條理分明，不但有我已講過的，還有我曾想過的：目的是只要不存偏見，定可搏取同情。同為絕大部份是大家想到或未想到而不敢出諸於口的實話。

事先安排好的發言人輪番上來，有人說：「我原準備聽孔今朋的認真檢討，誰知聽了他一個小時的大報告。」有人說：「孔令朋繼續放毒，我們不會上當。」有人說：「我們資本家接受社會主義的改造前途無限光明，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要好千百倍，孔令朋留戀過去，不滿現狀，強詞奪理，反動至極。」有人說：「依你平時水準，何至犯此錯誤，定是別有圖謀。」有人說：「當前社會主義的幸福自古以來前所未有的，孔今明說成一片漆黑，居心何在。」如此等

等，像演戲般地背了一段一段的台詞，以我作為 反面教員，從而展開反右鬥爭的動員大會。

我準備誠惶誠恐地接受批判，聆聽高論，遺憾的是批判內容空泛，幾乎沒有人針對我的「謬論」發表足以服人具有實質性的正論。

我既已成右派，我的任務只是當反面教員，不再列為 重點。学习的目的是揪斗其他重点对象。其後大會小會，日日批判。大字報鋪天蓋地，多不及我。最後揪出了私方經理胡鏡水、龔復三、劉卓卿，科長吳毓驤、貝諦華，組長鄔烈德等幾個右派，是為 第一批。

與此同時，外貿系統擺開其他戰場，先後揪出右派分子二百七十三人。其中有人在參加結束運動大會上，由於預定計劃配額不足，而被臨時點名，成為右派。

與眾不同的是，除開始時那次動員大會外，我在這學校裏未再成為 批判對象。可能因為 批判的目的的是為 了定右派，我既已成右派，用不着再批了，只是以旁觀身份看別人熱鬧。

值得一提的是，新聞日報學習專欄連續兩期以《馬克思主義萬古長青》為題，以《批判右派分子孔令朋反動謬論》為副題，組稿多篇，眾文同聲地斥我胡說甚麼馬克思主義還要發展。他們共同的論點大致是：如果馬克思主義還要發展，世界上還有甚麼永恆的真理。

使我引為自豪的是，直到最近幾年在大陸上才有馬克思主義也要發展的論說破禁出現，遲於我的「謬論」約三十年。

學校結業，回到公司，情況大變。辦公桌由大變小，換了地方不再臨窗；未言撤職而工作似有猶無，只有靜待處理了。

## 九、開除勞教 艱苦辛酸

人的基本權利是生存與生活。我原來不知對待那麼多右派究應如何處理。我萬未想到竟會幾乎同時剝奪了生存、生活的權利和做人的尊嚴。

一九五八年六月下旬得知右派分子處理辦法已由中央公佈，依問題輕重，分爲六等。一級是勞動教養、開除公職，二級是勞動教養，保留公職；三等是監督勞動；四等至五等是不同程度的降職降薪；六等最輕是只戴帽子，不予處理。

聞訊後自我衡量適宜哪種處理。人總是往好處想。我以為奉命鳴放於前，享受殊遇於後，對我的處理不至太重。如今回想，真是天真幼稚，幻夢難真。

七月一日處理公佈，我豁然榜首，開除勞教。至此方知右派之爲右派，原來處理如此嚴重。人事科長立即找我談話，告知明日去真如農村勞動，工資取消，由公安局按勞動教養待遇月發生活費十五元，沒有假期，不准回家，取消勞保待遇。這真是晴天霹靂，響應號召之代價竟如是耶！

我自七月二日起到上海郊區真如鎮嚴家弄從事農村勞動，受國棉五廠下放幹部監管，所幸他們不屬同一系統，相待態度尚好，農民也多和善。從這天起先後勞動了二十二年，艱苦備嘗，煉我筋骨。

這二十二年原應是我人生道路上的黃金歲月，而今能得生存，已屬萬幸。茲先簡述，至於有關勞動和戴帽升級，另詳專節。

我先在農村勞動，後轉農場。一九五九年秋有了為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帽的規定。當年和一九六〇年有極少數處理輕微的右派分子摘帽，給其他右派以極大鼓舞，但令人失望的是，摘帽只是形式上解除了精神桎梏和肉體折磨，生活待遇不動，原來以為可以恢復原職原薪純屬幻想。而且還拖一根尾巴，就是摘帽後帽子仍拿在群眾手裏，一不老實，再給戴上。

我在一九六〇年可能失去一次摘帽機會，因為八月間有一天正在遠離住地勞動時，忽聽廣播召喚四名右派回隊談話，我為其一。九月間，其餘三人都被宣佈摘帽，唯我除外，想來另有原故。也許是隊裏推薦而未被上級批准，然而至少這是個良好徵兆。果然，再一年即一九六一年九月我在長興島勞動時被宣佈摘帽。在眾多右派中已算較早，尤其受到與我同樣開除勞教處理者則以我為最早。摘帽的同時解除勞教。

由於我是開除勞教，事實上已經脫離外貿系統。所以摘帽後作為新進臨時工以最低工資四十四元由外貿局收用，不在編制，不享勞保和其他福利待遇。最可笑的是在每季度評獎時，我有評別人的權利而無被評權利。直至一九六四年才得轉正，工資不加，卻已可享受職工待遇。在全系統中這又是一次有獨無偶的特殊處理。

我至今由衷感謝某一個人或幾個人，是誰，我毫不知情，但其決定挽救了我的生存，甚至生命。因為根據勞教條例，受此處理者要脫離單位，移送公安部門，轉至外地勞教大隊從事改造。上海勞教人員都被送到青海、甘肅、安徽、浙江、江蘇等勞教農場服刑，上海外貿系統同此辦理，唯我一人例外，留在上海，去青浦、真如、長興島等農村、農場和外貿下放幹部及五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等一起勞動。我和別人的區別是沒有假期，

間或允許請假回家，或一夜或一天，時間較別人假期為短而且不能經常。這對我已屬恩賜，非其他勞教人員所能寬假。

右派分子的勞教不同正式勞教，沒有規定期限，不知何時解除。開除公職者固已脫離單位，解除後絕大多數既不能返回原單位，也不能遷回上海，只能在原改造地安排工作。幾句真話，痛苦一生。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等待我的本來應也是這般命運，而我何幸，得留上海，至少偶而能見妻兒。所以我感激不知誰何所作給我以特殊待遇的決定，否則不僅沒有我的今天，也許早已沒有了我的生命。很可能與我離津時的政治結論有關，當時不是說誰也不會動我一根毫毛嗎。

我在長興島外貿農場摘帽，調回上海江灣外貿農場養豬，兩年後再調外貿製盒廠製造紙盒。一九七二年又在「文革」中由四人幫欽點，戴上「現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四人幫打倒後不足半年，即由中央專案組來滬宣佈無罪，一九八三年五月改為徹底平反。這又是我的一段難以想像的奇遇，其離奇獨特如非親歷，殊難置信。容另節述之。

## 一〇、先反漏氣 再當神仙

反右鬥爭的震盪還未在人們心田裏得到平息，種種運動接踵而來。花樣翻新，名目各異，而目標只有一個——整人。

先是向黨交心，要每個人狠挖靈魂深處，把曾經說過對黨不滿的話，做過對黨不利的事，甚至埋藏心底不可告人的意見，統統要掏出心肝來交給黨，以示忠誠坦白。大字報琳琅滿目，無奇不有。自暴隱私，互揭人短。

接着在外貿系統裏又搞了個「反漏氣運動」。原因是過去私營企業在業務交往中與海外客戶往來密切，函電頻傳，必須交代出在接觸過程中都洩露了哪些國家機密，傳遞了多少經濟情報，造成了若干重大損失，是謂「漏氣」。不僅自我交代，還要相互揭發。可貼大字報，可寫告密信。「漏氣」內容隨心所欲。以至人心惶惶，朝不保夕，魂魄飛散，一日數驚。

我此時已成右派，不再作為重點，卻也不能不投身其中，表明態度。譬如當初與海外客戶討價還價，說別人報價較低，均屬漏氣。

由於反右中凡有涉及「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言論都要廣受批判，因為英明聖斷是「只有外行才能領導內行。」，上海外貿從業人員，尤其是私營企業原有職工，一律涉嫌漏氣，多被調往內貿當售貨員。例如：永安公司郭家小姐郭婉瑩（吳毓驤夫人）調賣水果；著名梅派票友包幼蝶（現在香港）調賣炊具等。既是只有外行才能領導內行所以再調內貿人員經營外貿，實行自搞一套，以我為主。開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之先河，只顧滿足宣傳，不計國家損失。

反漏氣運動中被認為有問題的對象，處境悽慘，苦不堪言。例如：私方人員張乾恒於合營後在公方領導下以原來企業名義與陳嘉庚先生屬下公司進行業務往來，在一筆為數至微的文具交易中發出了一份「存貨無多，欲購從速」的電報，這本是商界促銷普通用語，卻被認為嚴重漏氣，逮捕入獄，反銬多日，備受虐待，其荒謬可見一斑。

運動過後，約在一九五九年前後幹部下放，五類分子和資本家一律下鄉勞動，大多安排在滬郊農場。我也由嚴家弄農村調往青浦淡水養殖場，另節詳述。約兩年後調回上海。

大風大雨之後總會有一時平靜，全國資本家提出了「聽、跟、走」的響亮口號，即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走社會主義道路。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在私方人員中層開了「神仙會」活動，開會學習，暢談體會，提倡和風細雨，堅持「三不主義」，「三不」即不打棍子，不揪辮子，不戴帽子。這就是說，棍子、辮子、帽子並非沒有，只是不打、不揪、不戴而已。當過小鬼，再做神仙，自然魏徵避路，人人歌德。嘆我仍是小鬼，無緣躋身神仙。

可惜神仙短命，好境不常，接着來了四清運動，誰被認為有四不清之嫌，必然要你好看。王光美就曾因此獲譴。

不過，這只是和風細雨之後的又一次大風大雨，與繼之而來的狂風暴雨相比，其整人程度真是微乎其微了。

## 一一、家瀕絕境 唯賴賢妻

我平時不事積蓄，但歷任職務，待遇均較優厚，所以始終維持着雖然談不上豪華富裕，卻也能算舒適安定的生活。右派處理前除二百七十元工資外已無其他收入，當時物價低廉，至少不愁溫飽。突然，開除勞教，月給生活費十五元，還不夠我一人之用，家庭生活頓失依靠。當時還以為支撐三四年應可恢復，誰知那是度以常情的夢想。

我妻萬復郁在與我結婚後即主持家務，未再工作。育有一女兩子，我在農村勞動時，次子一歲，長女長子正讀中學，分文無收，如何生活？

在當時，罪莫大於右派。既說真話，不識時務，應受天譴。不僅沒有人考慮到你如何生活，還有人趁火打劫，逼迫你無法生活。我又遭到了史無前例的肆意迫害。

古今中外，因事受刑者多矣。但即使殺頭槍斃，也不至取消家屬的居住權利。古所未有，獨我遇之。

我原住上海汾陽路一所四層花園洋房，一九五五年不堪房租重負，遷至上海新村十五號，合營後因收入減少，再縮租住面積，僅留二樓一層及亭子間一間。不料，我下鄉勞動未久，徐匯區房產公司（當時尚未成立房地產管理局）就派人來家迫我妻於一星期內讓房搬家，理由是我因右派犯罪，已無權租住原房，必須讓給對國家有貢獻的人來住。我妻單獨一人，抗爭無效，公司帶去所看備遷房屋，全都不堪居住。後來有位女私方人員出於同情暗示如果要求留住亭子間或可同意，經向公司一再懇求，總算恩准保留亭子間，還說是憐其母子，特殊照顧。那麼誰是對國家有貢獻的人呢？原來是徐匯區房產公司的經理葉某，他趕我家退租供其居住，所以我的住房被強佔早於「文革」趕搬家之風八年之多。這種事在當時全國罕見，上海僅有，這位對國家有貢獻的葉經理又被我碰上了。我妻在任人欺凌，嚴詞峻令的逼迫下，顧憐子女，只得委曲求全。其所受精神壓迫和心理折磨之痛苦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房產公司不以佔我住房為滿足，又把我保留下來的那間面積不足十一平方米，下有廚房，上有曬台，冬冷夏熱，陽光不入的亭子間的租金，按上海最高房租標準加價計算，提高了約有三倍。這樣差的房屋，這樣高的租金，在全國範圍內僅我一家。難怪在二十二年後我向徐匯區房管局提出申訴時，其局長（那位葉經理在佔我住房後年餘又調換了更好的住房）在聽我談及當年加租事時，不信竟有此事，當我面以電話查詢，方知確有其事。

中國有句俗話：吃人不留頭髮。我的遭遇當可證之。為民之公僕者竟不知世間尚有良知耶！

我們一家五口就在這間亭子間裏居住了二十二年。冬季冷透，夏季熱煞。室內只能放一張單人床，次子德群長到二十三歲還沒有睡過床鋪。其間甘苦，應可想見。

我先拿生活費十五元，後定工資四十四元，在長達二十二年之中，我家是怎樣生活的？也可以說我的妻子兒女是怎樣生存下來的。十分明顯，我的收入無法養家活口，我妻本無工作，現又不准工作。所以我說我失去的不僅是生活權利，還有妻子兒女的生存權利。

家庭生活對我妻來說是個突變，一付重擔壓在她的肩上。維持生計，養育子女之外，還要為我在外勞動擔心受怕。她因是右派家屬，沒有謀職資格。好不容易找了個替玩具工廠畫木製狗頭眼睛的零活，日夜趕工，月入不過三四十元。後來，私人不准攬活，她又因身份關係進不了里弄生產組。難得去電影廠當臨時演員，召之即去，一次三元。一個月最多能去三四次。後來即此也被中止。孤弱少婦，何以為生。只因我不識時務，坦陳己見，幾至陷妻子兒女於斬盡殺絕，萬劫不復之境地，思之愧疚，卻又無能為力。

前幾年曾有記者採訪時問我，當年生活艱困，歲月漫長，如何渡過。我打趣的答曰：「先吃鷄，再吃皮，後吃毛。」聽者不解。

吃鷄（機）是指先賣照像機、打字機、縫紉機、收音機等較易變錢而作價低廉的各種機。

吃皮是指賣我妻和我的皮大衣、皮袍、皮統、皮鞋等。那時東西變賣不當其值，例如我妻的一件銀狐長大衣只售二百餘元，我的水獺領金銀狐皮大衣只售一百八十一元，購者多為老大哥、老大姐和外國人，揀此便宜貨。

吃毛是指賣我的毛料西裝、毛衣、毛毯等。西服褲遠比上衣可多賣幾塊錢。

變賣究難持久，等到「文革」抄家時，我家裏除日常衣物外幾已空無所有。那些「鷄、皮、毛」全吃在肚裏。

我在家裏是長兄，弟妹們對我瞭解最深。他們知道不論在任何情況下我不會不愛國。在我下鄉後，三妹令智、四妹令嫻在她們微薄的工資中節省十元、二十元予以接濟。二妹令仁也有時寄款。此事被她們單位知道，責其不能和我劃清界限，也就是說她們不應讓我的家庭生存下去。幸虧她們解釋說，哥哥犯罪，嫂嫂和姪兒們是無辜的，不能放任不管，不顧她們的死活。當時能夠頂住壓力，需要不小的勇氣。在反右鬥爭的威脅下，有多少右派的親人被迫與之劃清界限，斷絕往來，借以自保。我何幸哉！

一九六二年冬，在巴西的舅舅于可長試探性地寄了一張明信片給母親，地址仍寫青島青島路一號。幸虧有位老郵遞員知我家新址，因此不僅和舅舅，也和在美國的長妹令和取得了斷絕十年的聯繫。信件須經香港轉寄，只能互報仍然活着的平安。我母在信中告知我的生活困難，那時令和還未在美國之音找到固定工作，依靠捱門推銷百科全書博取微利，她知道我如非迫不得已，母親不會向她求助。於是在有限的收入中每季度給我一百美元的接濟。那時人民幣是全世界最可靠的幣制，對美元匯率很高，最高時每美元僅兌一元餘人民幣。我得此幸獲喘息。後來她告訴我，知我困難，以為是略作貼補，絕未想到她寄來的竟是救命錢。她表示何以至此，無法理解。我也無法使之理解。

「文革」一來形勢陡變，國內的妹妹們備受衝擊，自顧不暇，只剩了令和的這份接濟。我妻的堅強意志和妥善安排維持了我們家庭的生存。她所依據的主要是我們牢固的感情和對我無辜的信念。有人在這種環境下想到的是死，而她

想到的是活。因為只有她活，子女才能活。她說：「如果我稍有動搖，令朋和子女該怎麼辦呢！」她是爲了我和子女強打精神活下去，在此我衷心表示對她的感謝。

## 一二、文革種種 疑非人間

文化大革命的實質是大革文化命。只有消滅了文化，才能製造愚昧。愚昧製造了神，神又利用愚昧役使着人。人被抽去靈魂，只知盲從的時候，就會遵照神的意旨去幹那些人所不能幹，不願幹或不敢幹的蠢事。

人生於世，所要求的除生存和衣食外，還有自由意志、生活情趣、道德操行、情感交融等、但「文化大革命」一來，這些要求一概消除殆盡，革掉了文化，也革掉了文明。有句名言：「八億人民，不鬥行嗎！」。於是人群已不再像以前那樣分成左中右，只剩下整人的和挨整的兩種人。鬥總要有鬥的對象，反右鬥爭已經把知識分子鬥得噤若寒蟬，潰不成軍，現在要鬥就要廣開鬥路，擴大範圍。鬥人的要找人鬥，不鬥別人別人就會鬥到自己。於是整人成了一門專門的學問。幹部整幹部，工人整工人，農民整農民，當然那些掌權者愛整甚麼人就整甚麼人，一群混人打的一場混仗。整人的一夜間可以變成挨整的，挨整的卻難再變成整人的人。有些人表面看來既不整人，也未挨整。實際上，他們在思想上精神上心理上已被整得動彈不得，失去自己的靈魂主宰。只能天天膽戰心驚地圍着一個指揮棒走，不敢稍有逾越。譬如不小心弄髒或弄破一張每天印有寶像的報紙，就會招來無法估量的人災橫禍。人之爲人，可悲亦復可憐。

著名文學家夏衍在文革獄中寫了一首詩，頗能傳神。詩曰：「聞道人須整，而今盡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還是我人，請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不過，整人也有好處。有些整人者在人亦整其人後，才有親身體會，為文革後的平反建立了思想基礎。

我不想在這裏多談「文革」。因為已有多種專著可供賞析。希望有一天會實現巴金的願望，為已經被徹底否定的文化大革命建立一座博物館，留諸後人，知鑑將來。但是我既投身浩劫之中，也不能不就親身經歷，略述一二。

一九六六年夏，「文革」開始時，我早已從外貿農場調到外貿製盒廠，改養豬為製紙盒，由市郊返回市內。紙盒廠雖僅二百餘人，組成十分複雜，約略分成四類人。一是五類分子另加摘帽右派；二是歷史上有問題打入黑冊的各外貿單位的員工；三是改造過來的原小業主及其家屬們，後者多為沒有文化的中年以上婦女；四是革命群眾。由於前三者的人數超過後者，被稱為外貿局改造大隊，又因有前二者，也被稱為小台灣。上海類此性質的單位恐也僅此一家。

「文革」抄家，對象廣泛。抄家的小將們面對那些五光十色的所謂四舊物品和金銀珠寶，見所未見，大開眼界，頗感興趣。我家被抄排在後面，他們看見除三大疊售物憑證外別無長物，不像其他資本家家中那麼豐富多彩，知道我這個所謂資本家已經被榨得殼空油盡，所以特予優遇。只拿走了永遠無法補回的文件、信函、日記、資料等，還有僅存的白金婚戒。至於稍好衣物拿出來堆放一起，離去時給我留了下來。門口的大字報竟也破例未貼，因為那是招引隨意抄家的標示。對我來說這是一次文明的抄家，當時殊屬難能。我原有的「鷄、皮、毛」如未賣掉，抄家時自難倖免，而我家已把它們吃進肚裏。

單位抄家文明，里弄抄家野蠻。我所住的上海新村是資本家住所集中的里弄。幹部子弟眾多的一所中學就在附近，他們抄家成癮，晝夜加班。在他們帶頭下，任何不知來歷的中小學生只要帶上一個紅衛兵袖章就可任意進入人家進

行打砸搶拿的「革命」行動。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這些奉了神的旨意殺來的天兵，隨時可以登堂入室，爲所欲爲，無惡不作。晚間，家家熄燈以避其鋒。可是，陣陣傳來打砸巨響驚心動魄，夜難安枕。對他們來說，真正的「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因爲他們隨時可以敲門入戶，不存在閉不閉戶；他們不需要到路上拾遺，可以到家裏隨便拿取。紅衛兵的口號吆喝猶如鬼哭狼嚎，毛骨悚然。他們製造的人間恐怖，遠過夜行墳地，人已被壓抑得沒有吹口哨壯膽的勇氣。

紅衛兵們不滿足於打砸搶拿，他們有些惡作劇更是令人髮指。例如：他們來時家裏正在煮飯。就把醬油、鹽、醋、胡椒等全都傾入鍋內，逼人吃下。見有化妝品，就把油漆、紅藍墨水等塗在婦女臉上，說：「你愛美，讓你更美。」畫框、衣鏡全被打碎。打罵罰跪更是隨心所欲引爲笑樂。他們看見甚麼，覺得新奇好玩，拿了就走。有人說，他們無法無天，並不全對。這班成長中的青少年，被塑造成妖魔鬼怪，在他們心目中有法有天。法就是造反有理，天就是神的旨意。

打砸搶之風傳自北京，先由豪門子弟組成名目衆多的紅衛兵團，編製等級按照他們各自的父兄爲依據。老子官大的，兒子戴綢袖章，次者紅布，寬窄都有分等。首倡：「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不過，他們的老子一旦被打倒，自己也就跟着跌下「好漢」寶座，變成了「混蛋」，連紅布袖章也戴不成了。

有一次，清華大學紅衛兵殺到上海，聞上海新村之名，趁一個星期天來新村勒令所有五類分子和資本家列隊集合，到者六七十人，肅立恭聽他們頭頭的訓話，「混蛋」「反動」之聲不絕於耳，邊說邊喊口號，時值夏季，不少人戴

着抄家剩餘的手錶，全部被幾個女兵強迫勒下。當時單位抄家，一般還給留下隨身佩戴的手錶，紅衛兵則明搶豪劫，肆無忌憚。有一個女紅衛兵高舉剛被收繳的多塊手錶，得意忘形地大喊：「我發財了！」事實證明，他（她）們愛的是資產階級的財物，由羨慕而忌恨，產生奪人所好，絕其後路的心理。

十年浩劫中出現了數以千百萬計慘絕人寰的暴行，任何學生，任何工人，只要出身不是黑六類都可以參加紅衛兵、造反派，取得整人鬥人打人罵人甚至殺人的資格。所謂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黑五類、資本家、美蔣特務等等都由他們隨意點名成爲鬥爭和掠奪的對象。

這些奉旨造反的「革命者」喪心病狂，千方百計地對批鬥對象進行人身侮辱、肉體折磨、精神迫害、事實扭曲來滿足他（她）們殘酷追求的慾望。

懲罰方式從戴高帽，掛紙牌，發展到戴鐵帽，掛木牌、鉛絲繫頸，噴氣低頭。標準的架式是把被鬥者押到台上，低頭九十度，雙臂後伸，頸掛木牌，拳打腳踏，更有甚者以磚頭鐵塊代替大牌，不要說年老體弱，即使身體健壯也難以忍受。這些鬥爭方式，源自北京，風行全國，都是紅衛兵們所發明。因而折磨至死至殘至病至傷者責難盡數。當然，其中也有些人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整人者有不少也嚐到了被整的滋味。

根據他們自己出版的小報，有些詳載他（她）們鬥人整人的戰績，荒謬無恥，殘暴絕倫。有人說，女將之心狠手辣超越男兵，倒也並非虛語。據說，有位將門之女因受天安門上賜名之榮，改文爲武，乃以武爲本，每整死一個人就在皮帶上釘一顆五角星，炫懼其武功，傲視同僚。她現在和多得不可勝數的與她同類祖祖輩輩沒有海外關係的男女一樣，正在資本主義和地區過着比資本家還要資本家得多的資產階級享樂的生活。

上述種種，我非親歷，但是在我那小小的紙盒廠裏發生了幾件命案，無一而非出自女將之手。據一位因以鴨綠江橋為背景照了一張紀念像而被誣為美國特務的林姓職工說：當他被關在廠設私牢裏懸樑吊打時，動手最兇，甚至以竹籤插指的那些暴行都是幾位平時看來文靜溫和的女青年幹的。主其事者是位女車間主任。事後得知，我被排名第二，緊接林後，幸因私牢殺人過多被禁，我才得免於難。

「文革」中所表現出來的殘酷兇狠，罄紙難書。不過，看到劉少奇、賀龍、羅瑞卿、彭德懷等功勞蓋世的國之重臣，尚且不能自保的悲慘遭遇，那些遠離天庭，倖得一命尚存的凡夫應可心平了。

有人說，製造這些暴行是由於喪失了人性；也有人說，這是發洩了獸性。我看這些說法都不夠確切。人必須先有人性才談得上喪失，這些非人作為的本身證明了在他（她）們身上本來就不存在人性。稍有人性，何至如此。人至少是有心的。

不錯，野獸吃人。可是野獸吃人或吃其他動物只是為了自衛或生存，這是它們的本能。何況並非所有野獸全都兇殘暴虐，有些比人更溫順安祥，即使獅虎豹狼也絕對不吃同類。所以那些人吃人的行為不配稱為獸性，也就無所謂發洩了。

那麼，他（她）們是甚麼？我在人類字典上找不出一個適當的名詞。德國法西斯殺了那陸多猶太人，歐洲人；日本帝國主義殺了那麼多中國人，亞洲人，人間暴行，莫過於此。可是德國人和日本人並不任意殘殺自己的同胞。所以那些在十年浩劫中幹下疑非人間所有的暴行罪惡的東西，既不具有人性，也不配

有獸性，最多只能算是由神製造的一種活着的動物，在「文革」中顯露出來它們的本性。動物不死總是活着的。

十分慶幸，我在「文革」中雖然歷經劫難，卻從未皮肉受苦。所以我寫「文革」經歷，與眾不同，不能不說又是一個罕見的奇蹟

### 一三、沐恩優遇 暗藏殺機

這裏說的優遇是相對別人所受種種劫磨而言，和別人比較，我在「文革」中的經歷確屬奇持，可稱奇蹟。

甚麼叫做奇？在特殊環境裏的遭遇與眾不同，百分之百地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而竟未發生在我的身上，是即為奇。作為文革打擊重點中之重點，不經批鬥，不進牛棚，是即為奇。如無文革經驗，可能難以理解。

外貿製盒廠的特點是有問題的各色人等多過「革命群眾」，廠裏的造反風暴自然不會平靜。由於對象分散，俯拾皆是，初時對我並未觸動。後來全國普遍展開揪鬥，從各地來滬找我瞭解別人情況的外調人員源源而至，有時一日數起，先後多達一百多次。外調對象除親朋故舊外，多為曾在天津民食調配處任職的屬下。由於來人對解放前的情況缺乏起碼常識，往往以現在認識或主觀推測去比照過去，不可能不產生誤會，造成冤假錯案。我有時用在解釋上的時間多於實際內容。在我任調配處處長時所屬員工有三百多人，自己高高在上，多半不識，也記不得姓名，更不要說讓我一一介紹他們的歷史情況和政治背景了。為此經常發生無謂的糾纏，有時他們的無知令人吃驚。最難使他們理解的問題是，我如果不瞭解他們的政治背景怎能加以任命。例如為了一位我連姓名都不記得的「監印」，先後前來外調三次。「監印」在解放前的機關裏是個最低級

的職位，而他們認爲手持大印必是我的親信。又如，過去我的主任秘書和各組室主管都有我的一顆名章，凡不需我親閱的文件報表等就由他們代我蓋上一個名章。凡我自己看過的文件就簽上一個「朋」字以代名章。所以有名章的文件是我從未過目的證明。在解放前這是一般機關的慣例，主官只簽字不蓋章。而他們認爲既有我的名章必經我的親閱，如不瞭解則爲拒不吐實。就這個簡單的常識問題不知多少次費盡唇舌，他們也難以理解。

由於我的外調次數過多，引起注意。有兩個不同造反派的頭頭同時囑我寫歷史交代。反正資料現成，寫過多遍，就再各寫一份交給他們，未料卻無反應。在當時情況下，解放前比我的職位低下得多的人，例如僅有少校之嫌的對象已被認作是大老虎。文官薦任以上則必成重點。而我是簡任三級，卻無人觸動，不知何故。也許此時造反派們忙於武鬥，自相殘殺。然而他們並未完全放棄或放鬆對專政對象們的折磨欺凌，而且不同派別互爭對象，輪番批鬥，似乎不如此不足以顯其威風。我慶幸未被選中，也許資本家在他們的心目中不居批鬥主要地位。

比較平靜的挨到一九六八年春，突然從夾縫裏冒出一個自封大王的單幹戶姓褚的小將，專以資本家爲玩弄對象，每天集中這二十幾名資本家集中訓話，任意打罵。甚至對女資本家打耳光，揪頭髮，指定一個姓高，一個姓鄔的資本家爲其爪牙，提供資料，輪選目標。他坐堂時，高鄔兩人分立兩旁，爲虎作倀，迫害同事。受迫害的資本家們恨此兩人遠過小將。看見他們的嘴臉才知道爲甚麼閻王身旁總要站上幾個小鬼。

這位姓褚小將，幼稚淺薄，舉止輕浮，言語無味，面目可憎，活脫脫地沐猴而冠。平心而論，那位姓高的是借猴自保，姓鄔的則是假猴整人。其手段之

毒辣陰狠，實難形容。如果不見他之所為，則難知人世間會有怎樣的惡人壞人非人和小人。舉例言之，他每日晨間守候廠門等待姓褚小將到來則送上一張紙條內列當日應鬥某一資本家的姓名和「罪行」。有一次。他密告一位姓劉的資本家談及以前工資三百多元是妄想復闢，批鬥時劉君承認有留戀過去思想，小將立命自寫大字報檢討書貼於住所大門外。夜間鄔某騎車前往探視，見未貼出，次晨密報，劉君備受凌辱折磨長達數日，理由是拒不聽從小將命令。又如在批鬥一位女資本家時令其低頭，未從。鄔某就向小將耳語說她看不起小將，這是褚某自慚形穢之大忌，聞之立去打了這位女資本家的耳光。她被鬥原因是鄔某告密見她在菜場買了一隻大餅卻帶兩根油條，享受資本家生活。當天他自己卻買了一元錢的白切羊肉放人那隻表面破爛不堪的提包之中。見者不敢告發，恐被報復。又如有位馮姓女資本家在給小將寫的檢討內有八個小時句，簡寫的「時」易被誤識為「將」，部就誣她寫八個小將借以否認僅有一位小將，這位女資本家立即被鬥。像這樣的事幾無日無之。

我最初未被選為重點，後經高某告密方知我在解放前曾任高職，於是每天找我當眾交代問題，我的經歷人所共知，無可隱蔽。但後來迫使我交代涉及別人隱私而有關部門囑我保密的問題，我不得不告知當時廠內負責人平時為人正派的革命委員會李姓主任，才被制止。李主任為了瞭解褚某在資本家內胡作非為的情況，有一天邀我在廁所內密談。以防人知，是對我的保護。不料，剛坐在各自馬桶上，我陳言未久，即見門外人影一晃，李主任立即示我止言，告以鄔某在外。原來他已經注意到李我同時入廁的異常。僅此一端，可見一斑。

高鄔兩人挖空心思，害人保己的缺德醜行，實難盡述。人之無恥，何至於此。自己人搞自己人比外人尤為兇狠。這些醜行在「文革」中僅為小事。人而無德，司空見慣。錄此以見「文革」的一個側面。因為姓褚小將的任意橫行，

無人敢管，其情況較為特殊不同於還有規律可循的一般批鬥。褚某胡鬧數月，其風斷戢，不知是自感無聊，或是受命收斂。

一波方平，一波又起。一九六八年底我忽被喊去參加據說由外貿局在紙盒廠舉辦的集訓班。所謂集訓，實為交代。主持者不知來自何方。我報到之日就被找我去談話，很顯然在班內成爲重點。不過，集訓期間，學習文件，交代問題，不事批鬥。我知道炒冷飯不能過關，既不能無中生有，又不能自持清白。唯有就過去歷史，上綱上線，自陷於罪。但主持人總說我避重就輕，不吐實情。說實在的，那時精神十分苦悶，思想壓力很大，不知他們所指為何，甚至懷疑定是掌握了不實材料。不怕有事不能交代，只怕無事無法交代。

好容易熬到結業，由一位據介紹為張處長的到班講話，先說成績，再說問題。突然聲色俱厲地說：「班裏有人思想反動，頑抗到底。如再不思悔改。決無好下場。這人就是孔令朋。他頑固至極，現在押回廠去，開除出班，責令交代。」接着，我就由一位姓朱的女共青團書記名為押送，實則乘車同返，途中一言不發。我暗自擔心，此返必進牛棚，如何交代，心中無底，等待我的必是無盡批鬥，飽受皮肉之苦，不會再有自由。誰知到廠後，她讓我自回車間，未作任何表示，使我莫明其妙。以為苦難相繼，不知伊於胡底。不料，時過多日，別人批鬥相連，而我毫無動靜。至今不瞭解這是一齣甚麼把戲。感覺到這次辦集訓班的主要目的，似是專在給我以精神威懾，他人僅為旁觀。

回廠不久，製盒廠也和全市一樣，開進來工人宣傳隊，我又被宣佈參加「給出路學習班」。集訓班被開除的事，無人再提，此時又指定為重點交代對象。我剛開始交代歷史，就被制止。他們的頭頭說：「你的那些陳年舊賬我們早知道了，不必多說。你必須交代更重要的，原來不敢說的、以為別人不知道的那

些事。要另起爐竈，徹底坦白。」這一下，我可急了，真不知有何不可告人之事，要求啟發。他說：「解放前的先不說，主要交代解放以後的事，尤其是文革期間的。」我想起文革之初，我和友人徐家涵、劉海皋曾就所見街頭大字報和造反派小報的內容有所議論。我問是否指此而言。他說：「文革初期認識不清，誰無一點議論。因此判你是反革命，你心服嗎？」看來這又不是他們所要的。是甚麼呢？

既要解放後的事，我只得從解放後來滬的經歷寫起希望碰上頭，對上號。後來工宣隊一位姓楊的組長暗中告我：「看你是真心想交代，摸不準方向。我建議你先別寫事，無從和你有過交往的人想起。」

我一聽才感到一定是我認識的人中有誰出了問題，而我不知。也許他們被迫交代，逼供之下胡扯到我。我雖心中坦然，明知沒有做過甚麼壞事，由於不知是誰，只好搜索枯腸把所有有過來往的人逐一排隊，連一起打麻將、玩橋牌、做業務，以至跳舞宴會等接觸過的人，凡想得起的都一一列名以進，每人一條，浮於表面，不涉實事，自知無法過關，只求指點迷津。我把希望寄託在那位楊組長的身上，企待着他能透露點信息。

正在這時，怪事又來了。有一天忽得通知，到市體育館（原上海回力球場，後改盧灣區體育館）開全外貿系統寬嚴大會。到場一看，座無虛席，聲勢浩大，不下萬人。我心想又不知輪到誰倒霉了。先宣佈了幾個寬的樣板，又喊了幾個頑抗分子到運動場中心批鬥，作為從嚴典型。其中多為私方熟人。想不到，壓軸戲竟然是我。

先是，主持人高聲宣佈：「製盒廠人稱小台灣，牛鬼蛇神集中改造，有的已知悔改，有的負隅頑抗。他們當中有人問題最嚴重，態度最惡劣，至今不肯

交代，希圖蒙混過關，實屬罪大惡極。我們一定要把他鬥倒鬥垮。暴露他的醜惡嘴臉。」接着一聲大喝：「把孔令朋押上來！」我驚心未定，已被早在身後準備的兩名造反隊員，一人一臂，拉到運動場中央地位，勒令低頭示衆，幸而既未掛牌，也未採噴氣式上場手法。批鬥如此重大「罪犯」，在如此浩大場合，採此平和手法是罕有的。

立定後，只聽主持人說：「孔令朋問題嚴重，拒不交代，現在揪出來示衆，馬上押回廠去，勒令交代。」奇怪的是聚集了一萬多人，借用如此重大場地，並非讓我這主角有所表演，既無揭發，也不批鬥，只在群眾高喊：「打倒孔令朋！」「頑抗到底 死路一條」等口號聲中，我被押出廠外，先後不過十分鐘。出場後，由幾名造反隊員護送乘卡車回廠。途中我想這一下定進牛棚無疑了，無可交代，如何得了。

說這是怪事，因為我回到廠裏不知如何是好，卻被告知回車間交代問題。我說：「車間裏不能吸煙，我寫材料，習慣吸煙。」居然給我指定了一間空屋，可吸煙，可喝茶，獨自一人，無人看管。我不知這是否算是隔離審查，下班聽到鈴響，不敢離開。久待無人理我，只得出去問廠方領導，我該怎辦？不料，他說：「下班了當然回家。」天哪！這又是甚麼把戲。

在萬人大會中示衆，不掛牌，不批鬥，不隔離，而且既曰示衆，時間之短也至為罕見，恐怕全國文革之有此經歷者，我為孤例。世之言文革者多矣，有如此者乎！

令我脫產交代，不知所措，不明白為甚麼用那麼大的陣仗揪我出來，卻又置而不理。聽其自然。這時我真希望開會批鬥，從群眾的迫問中知道關鍵所在，究竟要我交代甚麼。可是，連陪鬥也從來沒有我的份。這種悶葫蘆憋得你比挨

打還難受，甚至想如果當初曾經殺人放火，至少有事可講，不至如此搜索枯腸，胡猜亂想，摸不着頭腦，真是痛苦已極。

楊組長是工宣隊裏的好心人，有一次他來問我交代得怎樣了。我說不是不想交代，只是無從交代。他暗示說：「你寫了那麼多有交往的人，全都沒用，應當抓住重點。你想想看你的朋友中有誰和你無話不談，現在出了問題，又和重要人物有密切關係。」交人不交事，就是他關照的。再經此指點，使我茅塞頓開，猜到他們的目的所在。就問所指是否劉海皋。他說：「你自己去想，不過要交代組織關係。」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們兜了那麼大的圈子，目的在此，以為撈到了救命稻草。

劉海皋是著名鋼琴家劉詩昆之父，原為天津資本家，為人正直豪爽，慷慨重友，當時和葉劍英元帥是兒女親家，與我多年知交，通家至好。文革前我妻和我常去他家吃飯，打橋牌，看電視。文革之初，由於他和音樂界知名人士時有過從，當年賀綠汀就是由他幫助去了延安，他很早就被音樂學院徹底抄家，稱他家為音樂界的裴多菲俱樂部。有一夜，突然以反革命罪被捕，原因及去向不詳。在此之前，他家已成禁區，無人敢去，他則常來我家閒談，議論時局，談談橋牌和街頭大字報等。那時劉詩昆被押，只有在大字報中略知消息，彼此均甚關心。可以說我們是文革後還有相互往來的僅有親友。在此之前，我因和他只是朋友關係，沒有任何歷史、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牽連。他既被捕，情況不明，以為至少與我無干，在交代往來朋友中雖然不得不簡單提及，沒有加以突出，以免給他增加麻煩。我雖曾想到在文革之初，我們和別人一樣有談及毛澤東、林彪、江青、張春橋等人的言論，只是你知我知。在交代過程中，也曾想到此事，怕他被捕後被迫交代，所以也曾試探地問過所謂重大問題是否指我與朋友間的議論，可是立被否認，已如前述，因此我未再想。

此時，既經點明，使我想起前些時接待外調人員時遇到的兩件事。

一是，北京來人向我瞭解馬小妹。我根本不知馬小妹何許人也。後經點明，才知就是葉劍英之女葉向真在滬生子後，由我妻介紹去當乳母的那位奶媽。我和她最多在劉家見過一兩次，只知她懷抱嬰兒，怎會知其來歷，身份，政治背景，甚至她在葉府情況。只好談了我妻受劉海皋之妻張敏君之託，曾在葉向真分娩前後去照料了幾天，正巧有人代馬小妹找乳母的工作，順便介紹，事先對她毫無所知，當時不瞭解為個奶媽也值得慎重其事的由京特來外調，雖感可笑，未以為意。

二是，劉海皋被捕後曾有北京清華大學紅衛兵三次來滬向我外調葉帥和劉海皋的關係，強調有甚麼說甚麼，不必顧慮，尤其着重葉劉之間都做了些甚麼，說了些甚麼，特別是談了哪些國家機密，有何議論等。對葉帥直呼其名，語帶敵意。我既不在場，也不知情，只知葉帥曾去劉家作過禮節性拜訪，平時無甚往來。張敏君則曾去京住在葉家，情況更非所知。

她們反覆追問，軟硬兼施，說瞭解劉我之間無所不談，必知內情。我說我們談不及此，我從未見過葉帥，葉帥不知有我。知無不言，不知不能亂說。每次談話耗時良久，看來他們並不一定想知真情，而是希望我在逼迫下胡洩幾句，就可以滿足所需，我既堅不鬆口，只得悻悻而去。

有過以上經驗，開始察覺到她們志在葉帥，問題嚴重，卻與我無關。我只能從和劉海皋認識寫起，直到他被捕為止，內容也只能限於正常往來的事實。既被指定要談組織，我想到所謂裴多菲俱樂部，強調以前認為那只是指音樂界的那些人，現在認識到我既常去劉家。應也算是俱樂部組織成員之一。自以為這一下可以過關了，誰知不然。

我被告知開始觸及實際，卻又避實就虛，裴多菲俱樂部裏沒有我，我和劉海皋是另有組織。並且說明組織不一定有固定形式，只要相互勾結，同謀壞事，就是組織。

這一下我又傻了眼，唯恐是劉海皋在裏面被迫亂說，自己只有堅持。不知他說些甚麼，自己亂說，兩邊對不上號，豈非自找麻煩。幸而，不幾天工宣隊撤走，我又回到車間勞動，未再追問葉劉的事。

一九六九年秋，清隊結束，全廠資本家和五類分子與外貿系統其他單位一樣，宣佈去崇明東風農場勞動，我被分配在資本家小組裏。到農場後由外貿局宣佈來崇人員已經審查，各按目前小組定性。這樣，我仍屬資本家，問題已告結束，爲之放下心來。誰知好戲尚未登台。

#### 一四、歸隊勞動 再起風波

我到崇明東風農場後，和本廠其他資本家共同生活，共同學習，共同勞動，主要擔任一些輕便農活，如種棉，除草等。工作不重，生活艱苦，每兩月可回滬十天。我以爲既已過了學習開除和大會亮相兩個大關，飽受虛驚，卒告平安，問題應已清楚，可過幾天太平歲月。不料，風波又起，這次來的竟是龍捲風。

到農場後最大的好處是看不見那些橫眉豎目，自命不凡的造反派，倒也心目清靜。想不到，一九七一年二月突又掀起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運動。我已久經沙場，原想這些與我無關，我既不是五·一六分子，也已定性不是反革命，未多介意。不料，上級眼裝進出口公司派來級別較高的工作組人駐農場。此來又是沒完沒了的批鬥和交代，比過去任何一次更兇。

所謂五·一六原來是指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宣佈撤銷彭真等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代以以陳伯達、江青爲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聲稱「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揭開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序幕。次年成立了以反對周恩來爲目標的「五·一六兵團」學生組織。形勢變，矛頭變，人事也變，「五·一六兵團」成立未久即被取締，頭頭被捕，集團解散。一九七一年中共中央忽又決定發動全國性清查五·一六運動，誰也不知道在哪裏有個「五·一六反革命兵團」，誰是兵團的領導，然而伴隨清查階級隊伍，在全國各單位普遍展開從清罪行到清組織的鬥爭。反覆進行，越搞越大，處處逼供信，不少以前橫目狂喊的造反派如今忽又成了要登台坦白的五·一六，嚐到自食其果的滋味。

工作隊隊長姓錢，嚴厲兇狠，整人不留餘地，無限上綱，入人以罪。牛棚裏先後關了不少人，日夜加班大搞逼供信，硬把幾名右派打成「反革命小集團」。這時與我同隊的資本家全部脫產交代，和以前不同的是，強調了「文革」中的言行作爲，尤其是「防擴散」「聽敵台」和「裏通外國」。所謂「防擴散」主要是指對當時中央領導人如毛澤東、林彪、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的批評和議論，包括未對人言的腹誹暗諷。號召要交代性命交關問題，講了要槍斃的問題，當然，鼓勵揭發告密。

不知爲甚麼，碰到我的事總是與衆不同，獨具一格。在任何場合都是突出奇特，對照鮮明。這次使我頗感驚異，卻也略得安慰的是那位兇神惡煞般的錢隊長每來巡視資本家的交代時，對每個人都是疾言厲色，唯獨到我面前則是和顏悅色，囑我安心交代，不必顧慮。同組中人都明白何以唯我獲此殊遇。我以爲一定是我的問題已經審查清楚。

在交代過程中，不知開了多少次批鬥會，主要對象是五類份子和個別資本家，不但不批鬥我，而且指定我在會上發言批鬥別人，先給我一些材料，上網上線，空發一通議論，反正是做戲，誰也不會當真。

奇怪的是，別人陸續重去勞動，停止交代，名曰解放，而遲不放我，直至成爲最後一人。對我依然十分客氣平和，可是繼續交代，無休無止。在我的人生旅程中不過辦過那麼幾件事，交代何止千百遍，再交也是炒冷飯，不能過關只有不斷往高處上線，最後索性上網到自我檢查在解放前平津一帶內戰期間解放軍戰士和平民百姓的犧牲苦難應由我負主要責任，雙手沾滿鮮血，因爲沒有我供應國民黨部隊的軍糧，他們縱然受命也無法打仗，解放軍和老百姓不會受害。這是被逼無奈，只圖過關，如此重罪，死有餘辜，還有甚麼不敢交代。誰知這仍被認爲是鷄毛蒜皮，避重就輕，以數量代替質量，不肯接觸實際。說實在的別人不肯也不敢這樣上網，明知是假電會如獲至寶，釣得大魚，有幾個腦袋也會被砍下來。在我則不然，仍然對不上號。

我見此路不通，經過暗示和揣摩，逐漸領悟到他們對我的歷史不感興趣，要的是「防擴散」材料，我在文革初期曾和徐家涵及劉海皋談論過，前已交代，並且問過得到「文革初期誰無一點議論，因此判你是反革命，你心服嗎！」的答覆。不過，此一時，彼一時。目前的重點指明要「防擴散」，這是個前所未聞的新名詞，也許是爲了防民之口勝於防川。我只有改弦更張，轉變方向。可是，翻來覆去也不過是議論無法理解的若干現象的一些話，而且和徐劉所談大致相同，只好從事之緣起談起，有前因，有後果，詳細說明當初有感而發，爲甚麼會有此議論。所議都有事實根據，並非空穴來風，而且出你之口人我之耳，

並未向外擴散。這一下，對頭了，我被告知所寫材料必須密封，只准交給工作隊的錢隊長或一位姓姚的女書記。這種議論在當時全國皆然，非常普遍，而今如此慎重，出我意料。我知道既以「防擴散」為重點，別人也有所交代，錢隊長在訓話時說：「你們講的一些話，反動透頂，十分惡毒。我為工作關係不能不看，看了也是犯罪。」怕這麼幾句話，神經脆弱一至於此。可憐亦復可恨。

其後有一天忽然來了兩位自稱外貿局幹部的人，對我慰勉有加，說經過歷次運動考驗，知我交代態度相當認真，這次也不例外。不過我以前交代多限過去歷史，黨對此早已清楚，所以要求我交代新問題。我已交代一些，還應有所補充。也許時間較久，記憶不清，出於對我的信任，所以符來核對，希望能幫助黨和政府弄清問題。這一番話真使我受寵若驚，想不到在驚濤駭浪中竟有一股如此春風。

誰知，他們一開口，我才察知問題絕非簡單。原來，他們先提出幾句批評毛澤東、江青等人的話，問我曾與何人談過，其尖銳刻毒遠過我們議論，有的跡近謾罵，聞之心驚。我趕快力辯其無，否認曾說過類似的話。

他們接着說：「這是我們掌握的內部絕密材料，出於對你信任，才向你核對。你只准聽，不准再向別人擴散，否則責任自負。」在得我保證後，他們又說：「既然如此，現在將掌握的材料一條一條地向你核對，曾講過的就說講過。」從他們先後透露的幾十條議論中真是聞所未聞，大開眼界。可能這正是錢隊長所說「看了也犯罪」的那些話，而今竟准我聽。表面上是信任，實際上是陷阱。

在聽到的幾十條中約有十條左右是我們曾經講過或與之類似的話，如毛澤東大殺功臣；江青弄權整人，人心不服；江青歷史；林彪奸臣相等。有出入處

加以糾正，同時說明當時背景和議論由來。有則說有，無則說無。他們要我立即寫成「防擴散」材料交上，說是幫助弄清事實。

事後回想，這是他們投我心意的一種手段，用到處搜羅來的那些材料詐我入彀。而我當時不知劉海皋在失去自由後曾被迫說些甚麼，爲了替他解脫，所以在交代申明確表示除我的交代外，劉我之間沒有其他的話。如他所交代的內容與我不同，那必是他在逼迫之下言之不實，應再詳查對證。我保證所言均實，可負全責。他們真可謂爲達目的不擇手段，欺蒙詐騙無所不用其極。

材料交上去，又出新問題。因爲我對某一問題總是籠統地說議論大意，他們要求我把你說我說分別清楚，對口成詞。這很難辦到，因爲你一言我一語難分彼此。於是不得不在事實基礎上加工編造，像劇本一樣，各有台詞。不過主要的話都放在我身上，這樣做是因爲劉在獄中而我得信任，處境較好，問題不大。更主要的是怕寫上他沒有說過的話，他在裏面無法對得上號，造成額外麻煩。

我不相信在「文革」中還有別人被以這種手法套取交代材料，在所受優遇中確以爲我是已被信任。

運動期間假期過後，好容易熬到最終解放，卻不料別人放假回滬，獨我留場不歸。這一着和我所受優遇反差太大，誰也不明底細。再加上運動期間不准和家人通信聯繫，我之不歸，引起妻兒恐慌，四出打探，誰也不知原因。相熟資本家只是告訴她我不批不鬥相待不同一般。而我之不歸的表面理由竟是要我留場在資本家度假未回期間，負責監督同時留場的五類分子。冠冕堂皇，神機莫測。

時經五個月，我才得與大隊一起撤回上海，仍在製盒廠勞動。當時不知所經種種不僅是場風波，而是龍捲風的前奏。

## 一五、加冠進級 帽戴現反

沒有見過全國風行一時的向毛澤東像早請示、晚匯報就不知道人世間還有甚麼鬧劇比這更淺薄無聊的了，在當時卻是至高無上，風雨無阻的大事。愚夫村嫗到土地廟燒香與此不同的是在他（她）們心中隱含着敬畏的虔誠。

製盒廠在院側豎起了一幅《毛主席到安源》的巨幅畫像，這是權威的象徵，革命群眾的籃球不能打了，因為誰不小心一球打着實像，立即成為現行反革命。在當時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比印有、畫有、雕有毛澤東像的物件更脆弱的了，脆弱到拿在手裏人人會感膽戰心驚。

製盒廠人員龐雜，經過清隊，被審查的對象多過革命群眾，每天規定午飯前這班人先到實像前低頭認罪，等宣佈解放方可飯堂用餐。幾行排開站成一片，馬路上過往行人望入廠內，看見這些人不知是敵視，是同情，或是當成被耍弄的猴子。

資本家雖然也得請罪，究屬人民內部矛盾，可享輪流飯堂洗碗的特權，每次二人，提前吃飯，這是件美差，因為一不請罪，二早買菜。我也膺此殊榮，輪班之日可先買盆排骨之類。

我回廠後的日子並不平靜，經常有兩位外來身份不低的幹部找我談話，或來廠，或來家，主要還是追問葉劍英和劉海皋的關係。有時還問就我所知劉海皋家屬的生活起居、對劉之被捕有何認識等等。我只好說，劉的妻子女兒都認

爲既是被捕，必有原因，可能受劉詩昆牽連，希望能知究竟，以解疑慮，但都不相信劉是反革命，他們說：「到時候她們會知道的。」相待態度，十分和霽。

時屆年底，爲首一人突然和法院一位女書記官來廠找我，出示一張紙，要我照抄。我一看是我在交代中提及議論江青出身等七八句話，無頭無尾，斷章取義。我立即表示異議，認爲我的交代都有談話時的背景和緣由，不是孤零零憑空而來，而且議論中有對有答兩人的話都有，而今只抽出單獨幾句，不符實情。他說：「你寫交代材料太過囉嗦，應當簡單明瞭。既是你們說過的話、又在你交代之中，照抄即是。」我迫於無奈，只得照其樣本抄了一遍，心中很不是滋味。他說：「劉海皋已經被捕，法院需要材料，你是盡幫助政府弄清問題的責任，不必有所顧慮。」我知道這一手必與劉海皋定案有關，不但不容稍作解釋，證人所出證據竟是照抄法院代擬的原稿，不准證人多加一字，更改一字。古今中外自有法院以來，如此取證，恐爲僅能出現於「文革」中之創舉。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原應輪我洗碗，上午接到通知，下午去公司開會，中午不必洗碗。我當時還未察覺這是個危險的信號。事後思量，自己太缺政治敏感，因爲不讓洗碗，就是已被摒出資本家之列了。

下午隨衆乘車去服裝進出口公司，進入會場，發現氣氛有異。上海市公檢法（公安、檢察、法院合稱）人員到場，高踞台上，開寬嚴大會。我因毫無先兆，沒有想到此會爲我而開。到會後還和左右同事談笑自若，猜測今日是誰遭殃。

開始時先傳公司裏被當成突出重點屢被批鬥的一位私方人員出場，我們以爲是爲他定案。不料，公檢法宣佈對他從寬處理。那麼，對誰從嚴呢？我心中

暗覺不妙，依然希圖僥倖。從寬者幾經批鬥尚且無事，我既從未批鬥，而且優遇有加，連叱責的話都未聽過，應不是我。

誰知疑慮未定，突聞一聲斷喝：「把孔令朋押上來！」還未等我轉過神來，已有事先坐我背後的兩名造反隊員一人抓住一臂把我推到台前，抓掉帽子，嚴囑肅立。

這時，有一位姓薛的造反派頭頭，上台宣佈我的罪狀。主要有四：1、曾是右派；2、曾任國民黨高官；3、結婚時由孔祥熙證婚；4、學習時常發怪論。只是順便提了句「文革」中和反革命分子進行「防擴散」活動，而未及內容。思想一貫反動，建議給以嚴懲。

接着，公檢法人員宣佈，我的罪行嚴重，姑念交代態度尚好，給予從寬處理，戴上現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交製盒廠群眾監督改造。在當時只戴帽不關押確是算是從寬了。

我驚魂未定，就被左右兩人押出會場，乘車回廠。到廠方見大門內外已掛出多幅諸如「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孔令朋」「孔令朋必須低頭認罪」等巨幅橫標。我一見此陣勢，心想這次真的完了，一定要進牛棚。不料下車後，囑我回車間老實勞動。車間裏的那些男女工人投我以異樣目光，並無其他表示。自此從資本家變成了現行反革命，由人民內部矛盾轉為敵我矛盾。

這是我被第三次押送回廠，始終未進牛棚，未遭批鬥。相信全國「現反」有此奇遇者僅我一人。

我既以「現反」定罪，所被揭發的四大罪狀乃人所共知，無一與現行反革命有關。奇怪的是劉海皋在我戴帽後一年才被判有期徒刑七年，罪名也是現行

反革命。他以現行反革命被捕，定罪則在七年後，聯繫到前些時的經歷，領悟到他和我的定罪均因葉劍英之故。他是葉的親家，我與葉從無一面之緣，同樣揹上黑鍋，豈不冠枉，作夢也想不到高層鬥爭，池魚遭殃。

戴帽給妻子兒女帶來的不安和苦難可以想見，所幸家人親友都知我是平白遭冤，未予歧視。幾年來的悶葫蘆至此總算打破。整我的唯一目的是爲了尋找材料，打倒葉帥。劉海皋既因兒女婚姻而獲譴，我因友朋往來而牽連。他的「罪證」主要是前些時逼我照抄的那幾句「攻擊江青」的話。他們爲了搞到這幾句話不辭辛勞，對我費盡心機地做了四五年的軟磨硬打的工作。

這年在家裏過了個慘淡無歡，陰霾籠罩的春節後，於二月間再去崇明東風農場勞動。這次同去的就是各公司和製盒廠的五類分子，其中有幾位新被戴帽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宣判期間與我相似，據說公檢法通知外貿系統，以春節爲限，戴帽從速，過期不候。所以來得及的匆匆給對象戴帽，不及辦的只好放人一馬。

我知江青早在她是藍蘋時代，想不到她和我還有這起緣分。她演電影，找男人，給無數無辜的人種下禍根。有人怕被打倒，有人怕被揭底，他（她）們就是不怕以犧牲國家、民族、人民的命運爲代價。神話畢竟是神話，有了神，才有瀆神的話。

## 一六、雨過天晴 還我清白

重來崇明，景色依舊，身份全非。全隊都是五類分子，承擔建築小工。歷時年餘，調回上海，仍在製盒廠車間勞動。所幸周圍多爲小業主家屬，她們自

顧不暇，對我無多歧視。造反派威風已過，不再經常找人批鬥，倒是那般民兵，不時掛上袖章，把五類分子集合起來過過整人的癮。

一九七三年間繼葉帥復出之後，劉海皋亦因劉詩昆的解放而獲提前出獄。他被判刑七年，而在判刑之前被關已近七年。我聞訊後心中暗喜，幻想自己問題也可捎帶解決。好容易盼到公檢法來人找我談話，給我兜頭澆了一盆冰水。他先問我知否劉海皋出獄消息，對此有何感想。我以為這是給我申辯的機會，誰知剛一開口就被打斷。他說：「你不要因你的同案犯提前釋放而產生幻想，你們各自問題各自負責。他是提前釋放並非無罪，你只有老老實實認真改造才有出路。」完了。

很多人問我在一九七四年排山倒海批林批孔運動期間我的處境，也有人以為我之受難是因孔裔之故。其實，孔裔與否，毫無關連，並未引人注意。批林批孔來勢兇猛，全廠也貼滿了東抄西扯的所謂大批判的大字報，只有三兩張以我為對象，問我對老祖宗的反動有何感想，除此之外別無任何動作。這可能是我所處工廠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而我已落入人間底層，無可再下。益以大字報都是抄來的，外間大字報裏沒有我，廠裏也就抄不到我的名字了。

在生活上，我仍是月入四十四元，半數交我妻家用，連同各妹接濟，不過六七十元，她憑此安排家事，一間小屋，窗明几淨，整潔無塵。妻兒子女，日夕相對，倒也煦融和樂。世事苦難，我不過更加艱困而已。在那歲月裏所求唯有生存，何顧生活。能得家人團聚已屬幸事了。

我身為現反，每月要向里委交一份言不由衷的思想匯報，每逢重要外賓來滬，我所住上海新村的淮海中路是機場入市的必經之路，懸掛彩旗，夾道歡迎，而我則被警告不准外出，以防破壞，失去人民資格。他如，毛澤東提倡不做壽，

可是誕辰之日全國吃壽麵慶祝萬歲，而我和其他五類分子在製盒廠食堂沒有吃麵權利，倒是只有我們這班「罪人」遵從了毛澤東不爲自己做壽的意旨。周恩來逝世後製盒廠設置靈堂，我等「黑五類」受命不准行禮吊唁。凡此種種都向人提醒江青以其殘花敗柳的肉體換取了真正愛國人民的靈魂。

「文革」後期鬧的鬧了，打倒的打倒了，破壞的破壞了，甚麼人性、道義、歡樂、情趣、友愛等等在生活中不復存在了，倒也落得空虛平靜，人只剩下了個有形體的軀殼。只有高音喇叭不時傳來每天讓人無法掩耳的樣板戲，刺激着神經，壓迫着精神，使人們知道磨難醜惡仍存人間，不論人有沒有自由，至少沒有不聽這鞭打耳鼓噪音的自由。我生性豁達，自得其樂，每隔幾天就吃一頓一角錢一盤的豬頭肉或豆腐乾，喝一杯八分錢一碗的啤酒。更高級一點是吃一角五分一碗的素紅湯和二角七分一塊的炸豬扒也算吃頓西餐，這已是力所能及的最高享受了。過一天算一天，不知等着我的還有甚麼命運。

林彪在一九七三年九月折戟沉沙，世間因攻擊林彪而獲罪者不知凡幾，在我的交代中也有議論林彪望之不似人君，一臉奸臣相等「罪行」，曾以爲事實證明所見無誤，此罪可免。後知有關林彪議論直至批林時的一致答覆是，林彪過去受到擁護是正確的，現在受到批判也是正確的，他在擔任國家領導人時對之妄加議論是錯誤的，理應加罪。不能因現在批判他而取消當初議論他的罪行。這就和解釋劉海皋提早釋放時的邏輯一樣，抓他是正確的，放他也是正確的，我對他之被釋存在幻想是錯誤的。所以我的命運不能自己掌握。那麼指望甚麼呢？

物極必反，天網恢恢，我總算活着等到了「四人幫」被徹底打倒的一天。國家、民族、人民的命運得到了轉機，我也開始了新的生命。雨過天晴，春回大地，我卒于慶還清白之身，還走了一步老運。

文化大革命被稱爲十年浩劫。浩劫兩字遠不能概括那十年裏中華民族和全國人民所受的慘痛災難和各方損失。根據官方統計，林彪、江青兩案中遭受迫害者多達七十三萬人，其中折磨致死者有三萬四千八百餘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時，葉劍英在講話中提到文革中「包括受牽連在內受害的有上億人，佔全國人口九分之一。」李先念也說：「只國民收入就損失人民幣五千億元，超過三十年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此數應較正確。我何幸而爲七十三人中之一。

總的講來，我還是幸運的。雖經妖風惡浪，尚能存活至今。著書回憶，安度晚年。思之也可心平了。

經歷中，任其捕風捉影，強加於我，去頭掐尾，斷章取義，混淆黑白，本末倒置，偷樑換柱，向壁虛構，無限上綱，一棍打死等，我都挺過來了。幸哉！

## 一七、工農勞動 二十二年

人生最寶貴的歲月是在經驗日豐，事業漸成的四十歲至六十歲這一段黃金時期，我卻恰在此時相繼不斷地或工或農地勞動了二十二年。當然。在全國範圍內有此「榮績」的何止千萬。勞動最光榮，不過，我之勞動是處於屈辱環境之中。我所幹過的行當，倒也不少，不能不說是人生中的另一番經驗。

我都幹過哪些行當？

## 種菜耘田

一九五八年盛夏，因開除勞教，被送真如嚴家弄從事種菜勞動，由國棉五廠幹部監督。原則上沒有假期，但每月可以容許請假回家一夜，在我已屬恩賜。家人盼我如我之盼家人。初到農村，遠離妻兒，身負惡名，被迫勞動，其心情可知。

所在農村以種菜爲主，生平初任農事，處處外行。烈日暴曬，嚴冬冰凍，都必須下田勞動。不過，看到自己參與施種的青菜生長成活，也不無樂趣。親身體驗了粒粒皆辛苦的沉味。逐漸熟練，日趨習慣。務農給我的最大好處是所患十二指腸潰瘍，原本每年數發，須賴特效藥維持，到農村後竟霍然全癒，從未再犯，當因生活簡單規律，不再勞心之故。

到農村未久，全國豎起三面紅旗，實現人民公社化、號召大躍進。眼見家家農戶的竈頭，一夜盡毀，男女老幼同去飯堂用餐，宣告吃飯不要錢，實現共產化。數千年的生活習慣全被推翻攪亂。吃飯不要錢不等於做飯不要錢，錢從哪裏來。一場全國性的鬧劇，鬧了沒有幾天，偃旗息鼓，草草收場，家家戶戶只得另起爐竈。一個腦袋憑空想要管起八億農民的肚皮，肚皮吃不飽，還得說這個腦袋想得真好。

大躍進，苦了我。社員記工分，算工時，多幹多算，總有所得。爲了創造一天等於二十年，夜夜熱火朝天，輪流加班。而我是右派分子勞動改造，每日白天勞動，夜晚加班，每月三十天，無一日休息。冰天雪地，我和少數婦女社員割菜上市，手凍得難以握刀，五臟俱僵，其艱苦責難想像。不過，勞動結果應有收穫，所謂種瓜得瓜，可是在大躍進的日子裏愚昧荒謬的事真是層出不窮，罄紙難書，今僅記其一二。

前面說過，人能造神，神能役人。不怕信神，就怕神信。人信不信神自己還可掌握，神信的事人則不准不信。例如，一九五八年四月間有一天忽傳聖斷，麻雀與人爭糧，罪當四害之首，必須聚而殲之，滅其族類。於是，全國下令停產一天，有的地方是三天，人人手持凡可敲得響的東西器物如面盆、鐵桶、鑼鼓、鍋碗之類，群出戶外，各守崗位，驅趕麻雀。一見飛來，就群呼狂敲，不使停留。據說不使停留棲息，力盡墜地自斃。我亦曾恭臨其盛，在上海人民公園裏喊叫一天，心非其妄，口贊其精。事後總結經驗，大呼戰雀全勝，滅其種，絕其生，收效巨大、決策英明。演出如此怪劇，堪稱世界之最。北京地處近畿，則苦戰三天，據云徹底消滅了麻雀。有統計說明北京苦戰三天，平均每二十五人，消滅麻雀一隻。十億人民，歡慶勝利，愚者其誰歟！一九六〇年又傳聖諭：「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蟲。麻雀是林木果樹害蟲的天敵。」

神信深耕密植，語云：「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大躍進時盛傳一畝水稻可產萬斤，幼兒橫卧稻上，報載照片為證。神既信此，人復何言。萬斤不足，紛紛加碼，以至保證畝產十萬斤。神有神法，斷言翻土一米，正合深耕標準。一言既發，全國奮起，我也親歷深耕之役。掘土時有下放幹部手持精細量製長度一米的木棒在旁監視，我隨社員掘土深挖，直至一米深度，幹部持棒時時測量，多一分太深，少一分太淺，剛巧一米方符科學論斷。

非歷其境，必視此為神話。這不是神話，而是神的話。信神神信，相互交錯，深耕密植導致熟土全壓下面，生土種上稻種，最後顆粒無收，自然地造成了後繼三年的「自然」災害。這麼幹「自然」會引起災害。

我既難得回家，第二年夏忽然得一美差，每天獨自拉着一輛黃魚車沿途收集西瓜皮、爛水果、果皮等，直至五公里外的曹家渡，拉回去以供豬食。在我

看來這真是天賜良機，因為不僅可以順便買一碗難得一食的餛飩或鍋貼之類，還可吃片西瓜，更主要的是可以在曹家渡和妻子通個電話，甚至邀她來曹家渡見一次面。其情可嘆，其苦可知。可惜瓜季一過，就時不再來了。

神話何止一件兩件，三四千年前我國冶鍊技術已臻精美，從青銅到鋒鋼都須先有烈火。如非無知及於愚昧，誰也不會想到小火鍊精鋼。可是在大躍進時代硬是有人發此奇想，掀起了一般厲行全國的大鍊鋼鐵的熱潮，民間獻鐵，到處徵集，把好生生的鋼鐵成品再回爐鍊成一堆一堆的廢鐵。這又不是神話而是神的話。人非盡皆愚昧，但信神如神在，投身大鍊鋼鐵是莫大光榮。不甘愚昧，不信其功，才是真正的蠢人。一煞時，鍊爐處處，烈火熊熊，全上海大樓和里弄原裝的鐵門全被拆了下來，鍊鋼去也。人造了神，神造了不得不信神的人。其結果是化有用為廢品，勞民傷財，國受其害。想當年秦始皇盡收民間藏鐵鍊成兵器以殺人，鍊成金人以鎮邪，如今鍊成的廢鐵唯一的功能恐怕是搬起來砸自己的腳。

如果說在勞動期間我還有甚麼幸事的話，我被剝奪了參與大鍊鋼鐵的權利，使我没有機會幹那古今中外史無前例的蠢事，應是最值得慶幸的一樁，因為身為五類分子不准參加大鍊，以防破壞。人類歷史五千年，還曾有過比大鍊鋼鐵範圍更廣、荒唐更甚、損失更大，愚昧更深的全國性盡失理智的事嗎。我未參加使我無愧於國家。

憑心而論，農村勞動是在國棉五廠下放幹部監督之下，除個別團幹部女支書立場堅定，界限分明，臉色難看，人情不通，卻左得可愛之外，他人待我相對溫和，最多是保持一定距離，而不拒人千里，所以精神上沒有太大折磨，肉

體上也算是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了，比諸那些因右派而遠去北大荒的人們，我何幸哉！

## 開塘挑泥

一九五九年秋，奉命調往青浦縣淡水魚養殖場，改種菜為開塘。理論上我雖已被開除公職，這次是與外貿系統下放幹部和五類分子、資本家等一起共同勞動。在當時，這是殊遇，已不再放逐農村，置之不理，至少說明外貿系統還未完全與我斷絕關係。我至今對此深表感謝。神在天上，人在世間。否則我不可能再有今天。

開塘勞動遠比種菜艱苦。勞動分工，階級分明。資本家開刀切土，五類分子挑擔裝泥，下放幹部吹哨監督。初去時，我手不能提，肩不能挑，逐漸適應，堅持鍛煉。我的性格從來不甘示弱。半年後已成強勞動力。一九六〇年夏開展大放衛星，號召一天開一個魚塘，迎星趕月，夜以繼日。人與機器的區別，只是人要留點時間吃飯、睡覺，其餘都要勞動。每擔泥約一百斤至一百三十斤，最多一天我挑了三百多擔。在此之前說我有此本領，倒是真的神話。人造了神，神話也有變成事實的時候。

開塘十分簡單，除了挑泥，還有拋泥，從水裏撈起來的泥塊排隊傳遞，拋接之間泥水四濺，濺滿衣服，大家戲稱為呢（泥）制服，任其所之，無暇洗滌。

我仍然沒有假期，別人兩週一歸稱為小禮拜，留家一夜；一月一天，稱為大禮拜。我能偶然獲准請假一歸，是最大的希望和快事。那年春節放假七天，我經特准回家三天，其樂無窮。一般勞改分子無此待遇。

竟日勞動，無處洗澡，其情可知。最多到河裏打一盆水勉強揩身。後來建了一間池淋兩用的浴室，實爲人間德政。

在青浦勞動年餘，先後開了二三百個大小魚塘，因爲放衛星，趕時間，粗製濫造，漏水坍塌，多不能用。其作用只是響應了大躍進的偉大號召，其結果是完成了一件化良田爲廢塘的壯舉。

一九六一年春，再調長興島外貿農場，兼營農作飼養，強度低於開塘。農場飼養果子狸，尿糞排入河溝，飄浮水面。我們受命下水摸魚，水深齊胸，狸糞沾身，竟處以從容。勞動煉人，糞都不怕，豈畏髒手。最大的幸事是我已可和別人一樣，假期回滬。心知離出頭不遠了。

果然，是年九月我也在宣佈摘帽右派名單之內。在當年受開除勞教處理的右派中，我縱非唯一，也是最早之一。從此回到了人民隊伍，我的妻子兒女聞訊後的歡欣鼓舞更甚於我，因爲自此他們才可在人前抬起頭來，不至橫遭凌辱了。

## 養豬能手

摘帽後不久調回上海，勞動教養同時解除。依照規定，我既已被開除公職，在解除勞教後，工作應由勞動局另作安排。已遣送外地的解教分子多是就地就業。不回上海。我在這方面是個幸運兒，其命也夫。

我被中國進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開除，此時仍由中進公司收用，作爲編外臨時工，按最低標準工資四十四元，已如前述。待遇雖低至極限，卻不得不感謝這是對我的特殊照顧。命當如此，更復何求。

我因是編外，不能在公司工作，派往江灣附近國權路的外貿農場當飼養員。報到後方知我的任務是獨自負責飼養八十頭豬。八頭一欄，十欄一排，我就是統率這些豬的光桿排長。豬由小養大，養至一百二三十斤符合出口規格時就全排盡售，不留僵豬。然後，周而復始，換養小豬。

我初時以爲一人養豬八十，何能爲力，稍後方知工作實甚輕鬆。豬食有專人配料煎製，大豬每日喂飼兩次，小豬三次。飼養員可用車去飼料間拉豬食，分桶分欄倒入食槽即可。我因有挑泥經驗，不用車而用擔挑，取其爽氣。後來又有專人送料，減輕負擔。除餵食外，每天打掃豬圈一次，有皮管沖洗。每天實際勞動不過二三小時。豬睡覺，我休息。閒來看看小說，悠哉悠哉，也很愜意。

也許豬和我有緣，飼養成績優良。年餘後我自抱奮勇，建議科學養豬，每頭豬在左右兩耳不同位置軋洞代號，飼料配方數量和成長過程逐頭做成紀錄，準備分析研究，講求最佳效果。我習性難改，不論幹甚麼都想出人頭地，向人證明，天生我才必有用。

農場遠離市區，每週可以回家兩次，一次一夜，一次一天，往返約三小時。無論冬夏，我都是滿身豬味，到家先在門外脫去外衣，方再入內，否則室小人多，一件外衣即可使滿室豬臭。自己也不知養豬養至何時，是否將成終生職業。有一次，新民晚報有「我愛這一行」的徵文。我也寫了篇「我愛養豬」應徵，歷數養豬之趣，惜未入選。

## 機製紙盒

一九六三年春，我又被調至外貿製盒廠。廠在市内十六舖附近，可以每天回家，結束了六年流放生活。

製盒廠生產出口包裝紙盒，其組成人員已詳前述。我先和一班老媽媽、家屬工等一起向已釘製紙盒上貼標籤，糊商標，紮線帶，黏紙條，後調機製車間，機器碰線、送料、堆放。製成後每捆四隻，練到可以雙手托起十幾捆疊成盒堆，行走自如，幹得相當出色。

入廠時我仍在編外，每季度依例進行一次評獎，分一二三三個等級。我可以參加評別人，但自己無權被評，眼見別人每季多拿二十至四十元的獎金。老媽媽們說，如我能被評，至少也是二等獎。

還在養豬期間，正副隊長商議，我一樣勞動且有成績而不得受獎，似不公平，曾不經評比，把我列入二等獎上報，結果被駁，理由是我不在編內，無法支付。可望而不可得這筆對我來說為數可觀的三十元財富。

一年後，經我一再申請，終獲轉正入編，工資仍是四十四元，但已可享醫藥報銷，參加評獎等待遇。

我因有資本家和摘帽右派的雙重身份，文革中五類分子和資本家一律不發工資，改發生活費，自報公議，規定本人十八元，供養的家屬每人十二元，家屬有工作的不發。依此標準，我可得五十四元，超過我的工資十元，改發生活費原是為減少工資，而我則工資低於生活費，只得自己識相主動聲明放棄多餘部份，仍拿四十四元。又是獨此一家，別無分處。

我曾故態復萌，提出出口紙盒必須重視質量，標籤軋釘均應整齊，污損殘次均須剔除不得出口的建議，被那位前面提到的女車間主任大加批評，她當眾

宣稱：「孔令朋是右派就是右派，不忘資本主義。國外買的是紙盒裹的商品，不是買的紙盒，把能用的紙盒說不應出口，故意破壞社會主義國家資財，豈不浪費。」外行領導內行，秀才遇到兵，這是當年中國出口不重視包裝，而致貨好價低的典型思想。包裝影響了價格，他（她）們還以為把殘次包裝出口是減少了國家損失，維護了國家利益。可憐可嘆。

我自一九六三年春入廠，至一九七九年春離開，在廠歷經包括文革在內的種種運動，戴上現反帽子，而後宣告無罪，除兩去崇明共約四年外，先後從事製盒勞動十二年。

## 建築小工

我兩去崇明東風農場，前一次仍事農活，後一次改當建築小工。

建築小工，活有輕重。輕的是給老師傅們拎拎泥桶，泡泡石灰。重的是卸艙，運料、搬磚、捐木、手拌水泥等。我被視為強勞動力，派幹重活。住處夏日密不通風，冬天室內結冰。每日一瓶不沸熱水，洗飲盡此。蚊蟲多時，在面盆內側塗上皂水，迎空一兜，滿盆盡黑。生活十分艱苦，勞動不依定時。一起幹活的全是五類分子，品質良莠不齊，文化水平不一。開口「我是大老粗」者還看不起知識分子，他們勞動人民，高人一等。

從船上卸料，最容易損挑的是紅磚，黃沙；最難辦的是石子、木材。石子難在鏟，木材重在捐。卸水泥我可以兩人捐三包，每包一百斤，走跳板如履平地。有時用方木代替跳板，寬僅三四寸，損料上卡車，僅三四人有此本領，我為其一。這是開塘挑泥時練就的功夫。船上木材，粗細長短不等，輪流下船，無容挑選，兩人首尾一搭，給來者放在肩上，自我掌握平衡，肩起就走。走上

跳板，如體力不支，十分危險，必要時不得不將木頭拋入河內，以防落水跌傷。四十歲前。我的生活養尊處優，四體不勤，而今年逾五十竟成勞動強手。禍兮福所倚，想不到二十年後竟因勞我筋骨，救我一命。此是後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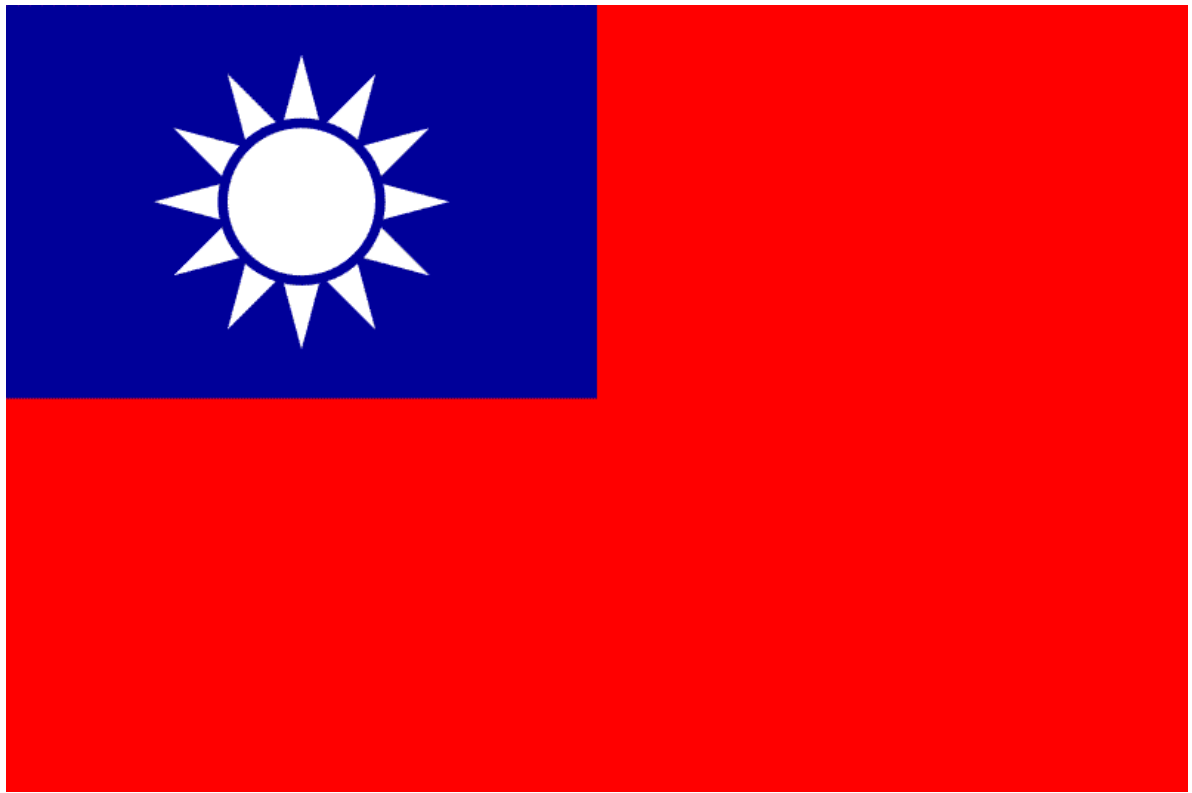
水泥也是重活，把水泥、黃沙、石子堆在一起，加上水不斷翻攪拌勻，越拌越重，力漸不支，後來有了攪拌機，用車送料，輕鬆許多。

這種勞動的好處是爽快包乾，幹完了如無其他任務即可休息。一天卸一條船，只需三二小時。船來得多時則很吃力。所謂休息，既無書看，也無消閒。有人終日捧一本紅寶書，坐幾個小時不翻一頁。我只好一煙在手，苦熬歲月。

定期學習，圍坐讀報。報紙每天印有實像和最高指示，拿在手裏戰戰兢兢，唯恐稍有破損，大禍臨頭。每季度舉行一次甄別評比，彼此攻訐批評，揭發挑剔。打擊別人，保護自己。道義淪亡，枉處人世。一旦被人抓住把柄，百口莫辯，萬劫不復。人人都像沉浮水中，想抓根稻草上岸。其實，整人者有，救人者無。洪洞縣裏沒有好人。

約一九七四年初再回上海，仍在製盒廠勞動。總計我前後從事或工或農的勞動長達二十二年，直到一九七九年三月退休為止。從此開始了我的老運。

永別了，二十二年的厄運。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